

中國邊政

第十二二期

目錄

略論憲法中特列邊疆民族條款之意義……………徐東濟

邊政漫談（一）……………許占魁

蒙古的月牙地……………趙尺子

甘肅走廊……………虞怡

漢人對西域之經營及西域文化……………羽田亨作・宋念慈譯

河曲藏區行腳……………張紫桐

古代文物在蒙古……………烏尼烏爾塔

西藏名稱與境域之沿革……………宋龍泉

正視中共圖滅藏族的罪行（轉載）……………黃敬文

特載

蔣總統接見日本編輯訪問團談話全文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出版

略論憲法中特列邊疆民族條款之意義

徐東濟

一 前言

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是以三民主義乃為立國之根本精神，亦為政府施政之最高指導準繩。至三民主義之涵義若何？國父孫中山先生對此曾昭示說：「三民主義之基本原則，對內實現民族平等，對外促進世界大同，此民族主義之國家，而非帝國主義之國家也。國民有直接選舉並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並複決法律之權，此民權主義之國家，而非代議政治之國家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展國營實業，以謀國民生計之均足，此民生主義之國家，而非資本主義之國家也。」蒙藏邊疆民族均為構成中華民族之成員，其所住地區又均屬國家領土之一部份，凡憲法中所規定者，自具有一般性，適用於全國者即可適用於蒙藏邊疆。惟由於蒙藏邊疆民族歷史關係、語文風俗、宗教信仰及經濟生活之特殊性，與內地各省市頗有迥異，因此憲法乃針對此種事實，對邊疆民族專列條款，以資適應。論者嘗以制訂憲法，實行憲政，容讓精神應為首要條件，藉謀共存共榮，各得其所；其次則謂憲法非法理之結晶，乃現實政治之反映，亦可說憲法若干條款之根本義蘊，應從政治角度來觀察。此殆為世界憲政思潮之所趨，而於我國憲法中特列邊疆民族條款，尤足表明其時代意義。所以總統曾指示說：「憲法『邊疆地區』一章，就是我們三民主義的民族政策共同的願望和要求。」

二 實現三民主義為國內各民族之共同願望

一般來說，一個民族之來源，應為由家庭擴大至家族，進而氏族而部族而民族之階梯逐漸發展成功，其結合成民族之目的，當在求保與養——自衛與覓食。然後由於生活條件、自然環境、經濟活動、婚姻關係及戰爭結果，使若干小的民族結合成一個大的民族，或由一個大的民族分散為若干小的民族。這些民族又基於政治與經濟之動機與目的，而構成一個國家。英國學者季麥恩（Alfred Zimmern）說：「世界所以有各民族，正猶世界所以有各個人，乃為全體而非為競爭。……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需要各種民族參加。」

至於構成民族之因素，非祇一端，國父孫中山先生指出，除血統、生活、語言、宗教與風俗習慣之外，最重要者為共同之民族意識：「民族主義之範圍，有以語言、文學為歸者，有以歷史、習尚為歸者，復乎遠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義範圍，則以意志為歸者也。」民族意識愈濃厚，其結合力則愈大，法國學者雷南（Joseph Ernest Renan）在討論民族之構成因素時，亦謂一個民族之結合，必由於大家有其共同生活之願望，他說：「以言過去，有

一個大家分擔的光榮和苦難，以言將來，有一個共同努力企求實現的計劃；曾經一同忍受，一同歡欣，一同希望；凡此種種，較諸具有共同關係，共同邊境，價值更多。凡此種種，縱然血統不同，語文歧異，大家却能深切了解。總之，一個民族必須包含悠久的共同的過去歷史，而對於現在，則其精華薈萃乃在顯明的同意與企求，要繼續一個共同生活。」

就以上論述，中華民族包括滿蒙回藏等邊疆民族，其共同之希望與企求實現之計劃為何？毫無疑問的當為實行三民主義。此在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中，早有政策性之宣示：「本黨致力國民革命既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唯一目的，則吾人對於蒙古西藏及新疆邊省除實行三民主義外，實無第二要求。」總統於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亦指示：「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國父首先宣佈『五族共和』的大義，以解除國內各民族的軋轢，而致之於一律平等的境域」。又說：「在中國領域之內，各民族的習俗，各區域的生活，互有不同。然而合各民族的習俗，以構成中國的民族文化，合各區域的生活，以構成中國的民族生存，為中國歷史上顯明的事實，這個顯明的事實，基於地理的環境，基於經濟的組織，基於國防的需要，基於歷史上命運的共同，而並不是全出於政治的要求。」從上項訓示我們可領悟中國邊疆民族之問題，不同於世界各國者，厥惟數千年以來各民族間之相互混合，相互陶鑄，文化與生存息息相關，現已鑄成團結之國族意識。正如美國學者何爾康謨（A. N. Holcombe）所說：「就其為現代政治之中一項力量而言，民族乃是對於一個祖國所發生的一種聯結情緒，一種僑羣間的同類意識，初不論彼此之間有其不同的宗教信仰，經濟利益或社會地位等等。」

三 以憲法解決民族問題之事例

法國學者雷南又說：「人們之意願確會變更。但世界之中，有何事物永久不變？各民族自非萬古永恒經久存在。它們會有其開始，它們會有其終結。也許將來會有一個歐洲聯邦起來代替。但此尚非我們目前所處時代之規律。就目前所處時代之規律，就目前而言，各民族之存在，乃是一件良好的事，甚至是一件必要的事。它們的存在，乃是自由之保障；倘若全世界祇有一套法律，一個主人，則自由將會喪失。」所以，今日世界上之國家，以複式民族所組成者比較為多。至其複式民族與國家之關係，雖皆依賴於憲法之規定，如蒲萊士（James Bryce）所說：「由一個民族性而成長為一個民族，再由一部憲法把民族發展為一個國家。」但由於各民族分佈約有三種形態，因而各國隨着環境之不同，其解決民族問題亦有下列三種方式：

(一)國內各民族語言、文化不同，但其人數、教育程度、經濟情況，則相差，而他們又各居一地，有完整之領土主權者，本來可分成數個國家。惟因各民族人數均過少，領土太窄，在今日國際社會，不能維持國家之獨立，因而便結合起來，組織一個聯邦國，瑞士即為其例。其憲法第二條曾說明：「組織聯邦的目的，在於確保國家的獨立，維持國內的安寧，保護各邦的自由權利，並增進各邦的共同利益。」同時憲法又規定各邦之參政權完全平等，各邦均有充分之自治權。

(二)國內有少數民族，其語言、文化與其本國民族不同，一方面他們聚居一地，而有完整之領土權；一方面他們又因歷史關係或條件不夠，不能建設獨立國，其國家對待之政策，雖組織聯邦，但政權必為多數民族所把持，蘇聯即為其例。如蘇聯以聯邦最高蘇維埃為中央立法機關，其中一院稱民族院，雖代表各邦，而蘇俄在民族院內却壟斷其大多數議席，所以由民族方面觀之，蘇聯是以蘇俄為盟主之聯邦，而非民族平等之聯邦。

(三)國內少數民族散居各地，無完整之領土權，不但不能組織聯邦，即民族自治亦難實現，而祇有特別保障他們之自由權利。如波蘭、捷克、立陶宛、拉特維亞等國，均於憲法中專列條文，保障其國內少數民族有平等之自由權利，有宣揚自己宗教，保存自己習慣，使用自己語言以教育兒童之權。此外，他們設立各種自治機構，以增進其自身文化與福利，並向國家領取補助金，以辦理其學校與慈善事業。

以上三種方式，為世界各國依據憲法解決民族問題之方式，但因各國議會向採多數決之辦法，以決定一切——哲林勒克(G. Jellinek)說：『多數決的思想是根據自然法的觀念，各人都有同一的價值，在同一價值的人民之間，除依「數」決定之外，實在沒有更妥善的方法。』但是民族之不同，既有事實存在，少數民族人數不多，所選出之議員當然也少，如在議會中提出關係其利益之議案，必難獲通過。所以一切問題對於各民族有重大關係者，往往不能在地方法解決，而須求解決於中央，在中央解決問題之際，放棄了多數決主義，採用協議之法，少數固應服從多數，多數亦應尊重少數，使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有平等發言之機會，以保障其自由權利。所以孟祿(W. B. Munro)說：『民主政治必須建築在容讓的精神上，沒有容讓精神，則民主政府就沒法執行職務。』

四 我國憲法對邊疆民族條款之規定

我國蒙藏邊疆民族由於分佈地區廣闊，且多僻處邊陲，交通尚未發達，以故其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事業，均有待於國家之培植，予以積極建設，俾依據三民主義之政策，使其達到民族平等、地方自治及經濟發展之目的，亦即國父所昭示者：「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壓制於一部者，

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又以各國憲法多本於自由主義派之理論而制訂，因而在消極方面明定國家不得侵犯人民之自由權利外，在積極方面國家之活動，更對此項自由權利採取保護政策，所以國父又昭示：「憲法者，政府之構成法，人民之保障書也。」我國憲法為適應時代潮流，乃於憲法中特列保障蒙藏邊疆民族之條款，以為立法行政之依據，茲申明其要義如次：

(一)民族地位平等之特殊保障 世界各國國民中，若包括不同之民族，為防微杜漸，避免變亂分裂之事故發生，則種族平等之確認，實屬必要。故此等國家對於國內少數民族之地位，均以憲法特別保障。中華民國建立後，本於國父所倡五族共和之遺教，遵照總統所訓示：「各省區以內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和經濟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達成我們各宗族間情誼團結，友愛互助之目的。」於是在憲法中特列下述兩條，申明對各民族地位平等給予保障。

憲法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憲法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二)政治權之特殊保障 民族不同，少數民族必永是少數民族，多數民族必永是多數民族，政治權利倘依多數決主義決定一切，則少數民族之政治權利當難於保全。所以國父在手訂建國大綱第四條規定：「其三為民族，故對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從下列憲法條文中，可見對蒙藏邊疆民族在政治上之特殊待遇：

憲法第二十六條：「國民大會以左列代表組織之，……(二)蒙古選出代表，每盟四人，每特別旗一人。(三)西藏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四)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

憲法第六十四條：「立法院委員依左列規定選出之，……(二)蒙古各盟旗選出者。(三)西藏選出者。(四)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者。」
憲法第九十一條：「監察院設監察委員，由各省市議會、蒙古、西藏地方議會，及華僑團體選舉之。其名額分配依左列之規定，……三、蒙古各盟旗共八人。四、西藏八人。」

憲法第一一九條：「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
憲法第一二〇條：「西藏地方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

(三)扶植教育文化之特殊保障 欲求文化水準之提高，人民智識道德身體之發展，必須使全國人民皆有受教育之機會，國父曾說：「圓顱方趾，同為社會之人，生於富貴之家，即能受教育，生於貧賤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公平之甚也。凡為社會之人，無論貧富，皆可以入公共學校，庶幾教育之患，不偏

爲富人所獨受，其貧困而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矣。」邊疆民族限於自然環境與人爲現象，受教育機會不能與內地各省市相比，因此總統指示：「對於邊疆各民族一切設施應培養其自治能力，改善其生活，扶植其文化，以確立其自治之基礎。又說：『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民族自治能力和地位，賦予以宗教、文化、經濟均衡發展的機會而增強其向心力與團結力。』」憲法爰特列下述條款，以爲保障：

憲法第一六三條：「國家應注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並推行社會教育，以提高一般國民之文化水準。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補助。」

憲法第一六九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予以保障及發展。」

憲法第八十五條：「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並應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考試院曾決議在臺舉辦高等考試，規定蒙古名額八人，西藏比照辦理。）

邊政漫談 (一)

一 前言

中國講求治道，大都推崇孔孟的學說，綜其要旨殆爲誠正修齊治國平天下與禮運的大同思想，就其大同思想不帶一點強制性，故可說是「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事。」不但上體天地好生之德，而且行人道共存之宜。倘用此種王道的方法以柔遠人、懷諸侯，必然是「近者悅遠者來。」四方歸向。所以論語孔子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凡是以行仁政，便能得民心，得民心則得國，進而可得天下。因而孟子也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殫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洎乎民國肇建，國父孫中山先生繼承了這一貫的正統思想，創造三民主義，倡導「五族共和」爲今日邊政設施的最高指導政策，筆者爰本此認識，不揣簡陋，就邊政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隨想隨記，故稱之爲邊政漫談。

二 邊疆問題的由來

(一) 由於滿足生存慾望的競爭

四受益權之特殊保障 受益權爲人民得從國家享受特定利益之權利，現代大多數國家之憲法，已隨民主政治之潮流，擴大受益權之範圍。國民黨第五屆八中全會關於加強國內各民族及宗教間之融治團結施政綱要案早已宣告：「對於邊疆各民族一切設施，以儘先爲當地土著人民謀利益爲前提。」我國憲法爲順應世界潮流趨向，顧全國內需要，因有基本國策之規定，所列各條除對國防、外交、國民經濟、社會安全、教育文化，提示其規模體制外，其中又特別邊疆地區一節，以表明國家應扶助其自辦地方自治事業，並從積極方面主動在邊疆地區舉辦各種建設事業，予以保障及發展，茲照錄憲法原文如次，藉明其梗概：

憲法第一六八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

憲法第一六九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事業，應積極舉辦，並扶助其發展，對於土地使用，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人民生活習慣之所宜，予以保障及發展。」

許占魁

人類都有求生存的慾望，人類爲要維持其生存，必須選擇優良的環境，以作自己棲息之地。凡氣候、地勢、水流、土壤、物產苟不利於人類的生存，人類必不願居住於其地。古代世界最大的游牧民族根據地，即在中國的北部和西北邊疆，此等地帶天氣寒冷，缺少雨水，廣大的草原和沙漠，無法發展農業，祇有游牧的人民，在此地帶飄蕩。游牧民族的武裝，以騎兵爲主，馬性愛冷喜燥，每到冬季，全身馬毛都長好了，所以說是「秋高馬肥」；騎兵的武器的弓箭，弓用膠質製成，即所謂角弓，天寒膠凝，弓硬箭的射程便遠，正如唐人詩中所寫：「風勁角弓鳴。」因此，游牧民族到了冬季，正值食糧斷絕而武裝完備的時期，於是游牧便南下覓糧，這是過去的史實。

與此種情況恰巧相反的，便是到了漢代，由於軍隊的遠戍，食糧補給困難，乃倡行「屯田」的制度，趙充國條陳屯田十二便，以寓兵於農，爲最好的事例。其後隋唐兩代相繼推行，於是中原溫帶的人民，開始向高寒地區謀取生活的資源。降至有清一代，除加強東北、蒙古、新疆地區的屯田外，更因中原人多食繁，謀生十分艱難，遇有水旱災荒，中原人民竟有「就食塞外」的舉措，於是山東、山西、河北等省的人民大量移墾蒙古地區，從事耕作。如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曾諭：「山東民人，出口外耕種者有十餘萬人之多，彼等皆

爲朕之人民，耕地料理生產，如不容留彼等，將使彼等往何處。」到了光緒年間，清廷且特派大臣督辦墾務。並逐次於邊疆地區增設府縣、墾務局、墾牧公司、農務公司等，由政府倡導協助中原人民向邊疆地區發展。但由於農業與游牧對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因此演變到今天，在蒙藏邊疆民族地區便發生所謂生存競爭的根本問題。

(二) 由於文化生活的差異

中國人衆地大，因爲分佈區域相當的廣，各以應付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逐漸演進，便各有其傳統的習尚，而其各別的特性，亦必隨之而成立，禮王制會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此種情形演進到夏禹治水成功，中原奠定國家的規模。商朝興起，爲推行統一全國的工作，當時曾實施三種政策和制度：(1)封建諸侯——其要點爲原則上確定國家的領土爲中央的首領所有，由天子分封給諸侯，令他們建制自保，所謂：「昔武王克殷，成王肅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屏藩周。」(2)宗法制度——規定天子與諸侯的君統，和卿大夫與士的宗統，皆以傳嫡長子爲原則，所謂：「立嫡以長，不以賢。」以減少紛爭。(3)禮樂生活的倡導——周公制禮作樂以「翊贊治化」，來代替原始宗教的儀式。惟當時這三項政策和制度所能實施的範圍，因有一定的限度，其已推及的地區，在新制度的位育下，且與中央政府所在地緊相銜接，所以稱爲內地，而其人民文化生活較高；其未推及的地區，則常保存他們傳統的習俗，且由於距離中央政府所在地較遠，所以稱其地爲邊疆，進步亦較遲緩。因此在文化生活方面，逐漸產生了差異，邊胞不自滿足的感覺，與內地同胞相歧視的心理，便難於長久融洽相處。

(三) 由於地理條件的影響

人類爲陸棲的動物，因而地球表面的自然現象，尤其是陸地的自然景象，常給人類以若干決定性的限制與影響，所以在陸地上人類的活動和生活，也受地形的種種限制，如浩瀚的沙漠及超過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均是人類不宜居住的地區，人類基本生活需要的食物，主要是依靠着動植物的資源，其分佈經常受氣候與土壤等地理條件的制約，因而人類生活文化也因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而有多樣的方式，形成與地理區位平行的分歧現象，就我國一般情況而言，內地邊疆有下述的顯明不同。

(1) 內地方面——因爲大部份地區適在溫帶，且爲重要河流所經過的平原，所以氣候溫和，水利充足，土地肥沃，高度的農業既便於發展，財富也容易增加，因而進爲文明富庶的區域。

(2) 邊疆方面——因爲地理的分佈，或爲高原，或是沙漠，氣候嚴寒，或者酷熱，水利未興，土地貧瘠，因而過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或低度農業的生活，生計艱難，進步自較遲滯。

在這兩種現象對照之下，即易引起邊疆人民不自滿足的感覺，而各自割據着一塊生存地區，局限在自己狹小的天地，非我族類即爲仇敵，從此因對立而甚至演變爲多少衝突事件。

(四) 由於民族構成因素的不同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指出：「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又說自然力分析起來，便很複雜：「我們研究許多不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從上述的遺教可知，民族的構成條件爲血統、生活、語言、宗教與風俗習慣；以言血統，數千年以來，由於各族在中原的角逐，當然互有融合，但在邊疆的滿蒙維藏苗僮等民族，其毛髮、膚色、頭形、鼻形、臉形、眼、耳、身、高、頭顱、骨骼等體質特徵方面，仍與中原漢族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以言生活，中原與沿海已由營農耕生活進展到工商業生活，而邊疆民族除極少部份營工商生活外，大多仍在營半農半牧或游牧和漁獵的生活。如論及語言使用，這是人與人間接觸的主要媒介，民族學者從語言的歷史關係區分我國語言有漢語、洞泰、苗僮、藏緬、突厥、蒙古、通古斯、伊蘭、苗吉等十餘個語系。如論及宗教信仰，宗教常代表着民族文化最固執的部份，目前有信奉喇嘛教的蒙藏人，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哈薩克人等，以及有汎靈信仰的苗僮人等西南邊疆民族，此外尚有信奉佛教小乘、薩滿巫教，甚或基督教的人。至於風俗習慣，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即自飲食衣服至於冠婚喪祭，都有一個處理的節度，對於每一種人、事、時間、環境的條件，均有適度的調合，換句話說，每一種風俗習慣的存在，都可看作是該一民族用以克服環境，保衛個人，繁殖種族的方法，俗話說：「入國問禁，入鄉問俗。」就是承認各地方風俗習慣的不同和互相尊重。所以滿蒙維藏等邊疆民族的習俗不但與中原未盡相同，彼此間均互有差異。本來民族的特徵如語言、風俗以及服飾、職業的習慣，均易促成種族的歧視，尤其是在雜居地區，此種歧視觀念，在優勢與劣勢或征服與被征服的情況下，常會引起實際的衝突。

(五) 由於對地方行政制度的歧見

孔子學說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本原，祇就其對邊疆民族的治道理想而論，他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這也是國父所常稱讚的「王道」精神，它在於感化人，而不是壓迫人；在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漢唐兩代開拓邊疆成功的事例很多，最足以代表。但是，另有一種政治觀念，即由於春秋列國努力開拓疆土的結果，中原華夏的勢力範圍愈擴愈大，凡有所征服，皆以郡縣組織之，使漸比於內地，以促進其趨向一型的同化，顧炎武曾謂：「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以爲縣矣。」左傳哀公二（公元前四九

三)年，趙簡子誓師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清代姚鼐對此會加考證說：「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為戎翟民軍長，故名曰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善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此種以政制組織華化的觀念，其後會深植於內地士大夫的腦海。迄今除部份有深識遠見的人士，隨着時代思潮的演進，已揚棄此種落伍觀念外；尚有部份人士仍偏執一端以談邊政，對邊疆民族居住地區動輒以取銷其原有地方政制組織，改設省縣為能事，而不求發展其文教、交通、水利等基本建設事業，以致邊胞離心離德，甚或發生地方不愉快事件。殊不知地方政制組織，為縣為旗或為宗（蒙古為旗，西藏為宗），只要無害於國家的統一和強大，何必一定取銷旗宗改設為縣，僅重形式上的華化工作，而不研求邊疆民心的爭取，引起邊族同胞的恐懼和反感。

有清一代極盛時期，曾用八旗、行省、盟旗、伯克、政教、土司、部落、宗主八種不同的政制，統治了滿、漢、蒙、回、藏、苗夷、外藩各民族，邊疆三萬里，相安二百年，治邊政績，卓然可觀。可是自清光緒初年，由於內政不修，外侮日極，英法併吞緬越藩邦，帝俄蠶食滿蒙和新疆，日本侵佔朝鮮、琉球，東北與新疆設省，趙爾豐做川滇邊務大臣，厲行「改土歸流」，於是宗主、八旗、伯克（新疆回族行伯克之制）三制取銷，土司、部落殘餘無幾，僅保存盟旗和政教兩種邊政制度，並未挽回清朝的覆亡。自民國肇建，五十餘年以來，蒙藏邊疆民族因與中原文化生活接觸日繁，向化亦深，其所能保留的民族特徵原已不多，蒙古盟旗制度和西藏政教制度，當為民族平等和實施地方自治的唯一保障。

（因由於疆吏的失職

自古治邊，如能選派公正清明的良吏，為國家久遠百年大計，不快目前一時小勝，不貪個人一己的私功，以郵愛、拊輯、教化、懷柔的政策為主，邊疆

蒙古的月牙地

(蒙古 于 霸月地口也)
(mongol un beyen tariya)

前為本刊撰「蒙古心臟地」、「蒙古心臟地的右疆」、「蒙古心臟地的上疆」三文，對外蒙古、中亞和鮮卑利亞的地緣作一鳥瞰。綜合三文可得結論：外蒙古人若不能自保其心臟地而甘做俄羅斯的附庸，則匈奴、蒙古兩大帝國的歷史光榮，將無法恢復。茲再寫「蒙古月牙地」一文，主旨在概述包圍在「蒙古心臟地」南方的「月牙形」地帶即內蒙古的地緣。吾人須知：「心臟地」固然可以自守也可以向外發展，這是麥欽德歸納歷史所得的結論；但當此二十世紀戰略核子時代，「月牙地」實能包圍「心臟地」而困阻之或毀滅之，這是麥欽德所未及知者。換句話說，只要「月牙地」

必相安無事。倘反其道而行，輒因薄物細故，而招致戰禍，歷代的事例很多，茲摘錄以下幾節史書的記載，謹供參證。漢書趙充國傳上說，西羌為邊患，酒泉太守辛武賢建議：「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黎平（羌族之一，地在今甘肅天水縣南）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懷。」漢廷公卿皆以為然，而趙充國獨不以為然，慷慨力爭，他所主張的辦法是：「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其後充國「兵至平升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芻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其酋）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遺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力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軍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後平升竟不煩兵而下。」宋會要議記載說：「太祖建隆二年（公元九六一）十月詔北面諸州，禁邊民無得出塞盜馬。先是五代以來，募民盜戎人馬。」同書又載契丹涿州耶律琚以書遺宋朝知雄州孫全興說：「往者晉氏後主，政出多門，惑彼強臣，忘我大義，干戈以之日用，生靈於是罹災。」在此我們再舉南方一個成功的事例，後漢書南蠻傳記載：「益州（今西康省越嶲迤南地區）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我們再看宋太宗的做法和想法，就可明瞭其得失了，續資治通鑑長篇記宋太宗於太平興國七年十月癸亥條：「詔緣邊諸州軍縣鎮等各守境力田，無得闌出邊關，侵擾蕃族，及奪略畜產，所在嚴加偵邏，違者重論其罪，獲羊馬牲口，並送塞外。上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政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竟欲酌前代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趙尺子

在中國控制之下，則「心臟地」終有「休克」的時候。外蒙古人對此應有所抉擇了。

一 地緣政治學上的新形勢

看完了心臟地外蒙古和她的右疆上疆的情況之後，我們要敘述包圍心臟地的月牙地——內蒙古（*émure mongol* 南蒙古）了。依地緣政治學，心臟地是壓迫月牙地的；但近半世紀由於武器、投擲器、兵種和心理作戰的進步，這一學問的學者們又發現了月牙地壓迫心臟地的力量比心臟地壓迫月牙地的力量更

爲巨大。這也就是說：內蒙古可以負擔對外蒙古攻擊或解放的任務。就語言方面說，內蒙古人士尤爲發動心理作戰的天然鬭士。當然，內蒙古現在使用的維吾爾注音符號所記錄的蒙語，沒有法被俄化很久的外蒙古人士所看慊，在文字宣傳上爲一最大的障礙；但內外蒙古人士及所有淪入俄國的蒙滿人士，若用慢晉說話，便無所不通。假使自由國家，我們願意特別提醒美國人，若能聘請自由中國的蒙古籍學者，依俄化的外蒙古和雅庫特字母，製造出大量的宣傳品，並利用「美國之音」發出播音，這對於解放被奴役的一千幾百萬說蒙語蒙文的人，真是上帝的福音了。

二 aimak hosiḡu 的意義

說到月牙地內蒙古可以攻擊或解放外蒙古心臟地，我們一經介紹盟旗制度，就可以洞悉中國清朝編組旗制必分左右以分進合擊外蒙古的本意。

在清朝以前，無論內外蒙古都以 *aimak* 爲單位。*a* 爲敬詞，即阿兄(*aha*) 阿爸(*abu*) 的阿；殷周字寫𡗗，說文：「𡗗，旌旗之游，𡗗褻之貌」。*ma*，殷周字寫旄，說文：「旄，幢也」；*k* 爲動詞或形容詞變成名詞時的文法記號，相當於杯子盤子的子。*aimak* 即𡗗本爲古代長條式旗的下垂狀，八百年來變成名詞的旗。清朝意譯爲部落的部，乃是不正確的。大約元太祖時代分封諸子諸弟建立屏藩，子弟奉其軍旗，懸於府邸，遂有 *aimak* 一詞。日久遂成爲政治單位之名。

清朝規定蒙古的軍事單位爲 *hosigu*，簡稱 *hosho*（譯音和碩）。周文寫旋施旂，說文：「旋，周旋，旗旗之指麾也」，「施，旌旗施也」，「旂，旌旗施旂」，三字轉注，意爲旌旗揮動，實不是旗，乃指旗的作用可以指揮（麾）。清譯爲旗，也是不正確的。旗的正字是 *i jagorton*，殷周文寫爲叭族旗旅旆，說文：「叭，旌旗之游，叭窺之貌」，「旅，矢鋒也」即旗桿，旗柄杓也，所以旃表士衆。周禮曰通帛爲旂。「旅，軍之五百人」，「旂，*i jagorton* 用五條長帛繫於桿上，桿有頂，授予五百人的軍團，士卒隨它行動」。元太祖的統帥旗改爲九游卽九條長帛。旗的另一正字是 *chimék*，殷周文寫爲旗旄，說文：「旗，熊旗五游，以象伐星，士卒以爲期」，「旄，幢也」卽獨雅的雕纛。這種旗旄乃跳舞時所執的旗。唐朝旗字「渠之切」卽 *i jarar* 的 *go*，尙存股周音；近代將旗旄的旗從 *chimék* 的 *chi* 讀音 *chyí*，已非古音了。清朝規定蒙旗的首長稱爲扎薩克 (*Jasak* 整敕)，扎薩克指揮的地區稱爲旗，旗字遂由五百官兵的標誌變爲一支貴胄的名稱了。抗戰期間有由西北大學謝在善教授署名的「伊克昭盟志」出版，這書是謝君等六位精通蒙文的青年，深入蒙旗實地調查而著成。調查時，獲准閱讀伊盟七旗的蒙文家譜，確知七旗的扎薩克都是元太祖二十二、三世的子孫。據此推知內蒙古一二三個旗和部，除東、

西土默特 (*dorona baragunsi tumut* 東、西遼萬，乃東部、西部萬人之意) 旗自稱瓦剌汗後人，及某某等旗係塔布囊 (*tabunang* 宗室的女婿，*bu* 在秦漢已寫成駙馬的駙) 之外，都是元太祖的血胤。但旗下的人民則譜系很雜，不過也都是匈奴、鮮卑、烏桓的遺黎，均為廣義的蒙古，也是毫無疑問的史實。

三 chigolgan tahimdagu 的意義

各旗之上的高級軍事單位稱爲 *chigolgan*，殷周文寫今合命僉，說文：「今，三合也」，「合，今口也」，「命，思也」，「僉，皆也」，四字轉注，意爲三方面會議運思而全體同意；實不是盟，僅係商量之意。盟的正字是 *ahigolgan*，殷周字寫爲盍血饑盍，說文：「盍，覆也」，「血，祭所薦牲血也」，「饑，汚血也」，即塗血，「盍，血醢也」，「盍，以血有所剋塗，祭也」。饑字重文爲盟，說文：「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愼、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盍血饑（盟）盍六字轉注，意爲殺牲祭血。夏殷時祭祖先曰盟，所以 *tahimd-ahgu* 的 *hi*（血）寫爲祀又寫爲孝；周朝諸侯召集「庫列爾」（*hural* 會命），歃血詔（告）天，也謂之盟；元太祖召集「庫列爾」，也應謂之盟。清朝以開會爲的 *chigolgan*（今合命僉爲歃血的 *tahimdagu*（盍血盟盍饑），實爲錯誤。

四
jasak
的意義

每旗設扎薩克 (Jasak) 一人，殷周文寫整敕。說文：「整，齊也」，「敕，誠也」，二字轉注，意爲站隊訓話。扎薩克是世襲的，祖孫父子世世繼承，這是夏朝「父死子繼」的遺蹟。不屬於盟的旗稱「部」，部設總管，由朝廷任命而不世襲。扎薩克或總管辦公的處所稱爲 yamun (序廡，俗寫衙門)，民國稱爲旗政府或總管公署。扎薩克或總管之下，設協理或副總管輔助政務，章京辦理軍事和司法，梅林掌理事務，筆帖式掌理文書。旗的下級機構爲蘇木 (sumu) 鈎銀，意爲鐵箭，設佐領 (sumu nu jiangi 蘇木章京)、催領、十家長等。

盟設盟長一人，副盟長一人，由扎薩克召集「庫列爾」選舉而出，都是扎薩克中年高德劭的人。盟長爲終身職。盟長逝世，由副盟長繼承，這是唐虞「禪讓」的遺蹟。盟長主持三年一度的「庫列爾」，祭天、祭祖、賽馬，這是「封禪」和「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匈奴傳）的遺蹟。盟長有權決定新扎薩克由故扎薩克的某子某侄繼承，呈奉理藩院轉請朝廷頒給銅印。民國以來，規定盟長地位等於省長（省主席）、都統，上項決定須經省長副署，發生許多流弊，例如烏蘭察布盟西公旗繼承糾紛，竟至成爲日閥導演僞「蒙古軍政府」的內在原因，良滋浩嘆。

五 清朝治蒙的大計和民國的失計

清朝對於扎薩克總管，均予封爵，分爲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頭等台吉共七級。公主（*Princess*，滿洲譯音格格）的兒子成年，也予封爵。封爵以勤誠忠勤爲等差，並爲世襲。襲爵有降有不降，惟世襲罔替者不降。清廷對封爵有升降之權。封爵不是虛銜，按級給予年俸：親王俸二千兩、級二十五匹，郡王一千二百兩、級十五匹，貝勒八百兩、級十三匹，貝子五百兩、級十匹，鎮國公、三百兩、級九匹，輔國公二百兩、級七匹，頭等台吉一百兩、級四匹。此外公主下嫁者及塔布囊（額駙）也都有一定的年俸。封爵是清朝治蒙的大計之一。從鬼方、獫狁、匈奴到蒙古，歷時約四千年的戰爭、掠擄、叛變，史不絕書；何以到了清朝便不侵不叛？主要原因便在這裡。民國以來，外蒙先叛，內蒙續叛，主要原因便是政府既取消了蒙古王公的封爵又停止了年俸。

扎薩克兼理行政和司法；人民對於扎薩克的政令和裁判只有服從，毫無反抗。清朝規定扎薩克凌虐人民，輕則減俸，重則降爵；故二百餘年尙少暴政。民國以來，扎薩克無爵（俗稱王公貝子等皆爲其祖先的封爵）無俸，加以物質引誘日增；於是橫征暴斂層出不窮。旗政府人員亦爲無給職，俗名「當差」，且須自備伙食，於是藉機貪污，無所不爲。蒙古人民的困苦，若非深入而長期考察，絕不會被外人所想像。

六 旗與縣的糾紛

內蒙自東北向西北現分爲布哈特部、呼倫貝爾部（均屬興安省）、伊克明安特別旗（屬黑龍江省）、哲里木盟（分屬遼北、吉林、嫩江三省）、卓索圖盟、昭烏達盟（均屬熱河省）、達里岡崖牧場、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東八旗（均屬察哈爾省）、察哈爾盟西四旗、烏蘭察布盟、歸化土默特特別旗、伊克昭盟（均屬綏遠省）、阿拉善和碩特特別旗、額濟納舊土爾扈特特別旗（均屬寧夏省）、青海左翼盟、青海右翼盟（均屬青海省）、巴圖塞特奇勒圖盟、烏納恩素珠克圖盟、青塞特奇勒圖盟、察哈爾特別旗、厄魯特（瓦剌）特別旗（均屬新疆省），共計二部、十二盟、六特別旗和一牧場部；盟下轄一二七旗（旗名參看周昆田「中國邊疆民族簡史」七二—一八三頁）。

打開中華民國全圖一看，只有興安、黑龍江、遼北、吉林、嫩江、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和新疆等省的省名，在分省圖上才能看到部、盟、

甘肅走廊

走廊的範圍

玉門關在敦煌，金城關在蘭州，金城和玉門，東西輝映，其間正是中國史

旗名。這因爲自清朝中葉到民國十七年約一百五十年間，蒙旗王公違背清朝禁令，私自放墾，大量漢族移住蒙旗，清朝並有計劃地獎勵漢商經營蒙漢貿易，許多大商號遂購地建堡，於是以前堡爲中心，開墾了許多牧地，吸收了更多的漢人，漸漸形成市鎮和農村，也漸漸發生庶政問題：清廷於是派官設縣（局），管理人民並仲裁蒙漢訴訟。清末設奉天、吉林、黑龍江、新疆四省，民國三年設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特別區，十七年升爲省，十七年設寧夏、青海兩省，分別將設縣的盟旗列入省屬；但未設縣的盟旗，仍由扎薩克總管統治，省縣對於盟旗行政向不干涉。也正因爲設省設縣，使省縣和盟旗接鄰地區及插花地區發生不少的行政糾紛和蒙漢訴訟。清末的「學好戰爭」（蒙漢仇殺），民初呼倫貝爾的叛亂，民二十二年錫、烏各盟的「高度自治」演變到爲「蒙古軍政府」，基本原因都在於此。

七 毛匪的措施及其意圖

毛匪竊國以來，清算了天生反俄反共的蒙古王公、貴族、活佛、喇嘛、盟長、扎薩克、旗長、總管，均被鬭爭，組成僞「人民自治政府」、「自治區」、「自治縣」，並把久經設治的綏遠省取消，轄境納入僞組織；從此存在凡三百四十年（清天命九年即公元一六二四—一九六四）的盟旗制度一筆勾消。毛匪這種措施，對內爲了討好蒙古「共黨」，對外爲了逢迎俄國主子，分批零售，替俄國從外蒙古心臟地向南緣的月牙地發展鋪路。四十七年赫魯雪夫培克毛匪，五十二年驅逐僞「蒙古大使」，近來更將派赴外蒙古的專家和技工完全趕回，這是爲了防止內外蒙古民間的民族主義的溝通。

八 月牙地壓迫心臟地

清朝編組蒙旗，分爲左右。試舉兩例：一、科爾沁右翼在王爺廟，左翼則在鄭家屯，右翼在北，左翼在南，面對熱河，察哈爾方面之敵；二、而察哈爾左翼各旗在東（察哈爾省境內），右翼各旗則在西（綏遠省境內），面對錫林格勒方面之敵。前例的坐標採周制尙右；後例的坐標採夏制尙左。就整個內蒙古來說，盟似今日的師管區，旗似團管區，蘇木似連，均面對外蒙古。假定外蒙古有警，清廷便可動員內蒙古的蒙旗兵，分成左右兩翼，向北出擊。這個態直到今天固然沒有變化；只惜內蒙已無可用的兵了！

虞 怡

書上最有名的交通孔道。以往文學家的歌詠，將士們的遠征，僧侶與商賈的往來，宗教、學術、藝術的交流，都與這一條交通孔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中

西交通發展的過程中，金城玉門兩地的交通線，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本篇所提的甘肅走廊，僅是金城和玉門兩關中間的一段，東起烏鞘嶺，西至玉門關以西，它的形勢，好像一條走廊，所以叫做「走廊」。又因為它在甘肅省內，所以叫做「甘肅走廊」。其實，這個名辭外國人早已用過。提到Kansu Corridor，外國人大都曉得。詳細考證這個名詞的起源，本篇無此需要。但有一點值得讀者注意的，此帶地方，甘肅人多稱之曰「河西走廊」，因為它在甘肅境內黃河之西。若放在整個中國境內來看，還是叫做「甘肅走廊」來得明顯。

要瞭解甘肅走廊的重要性，先要瞭解走廊本身的性質。世界上有名的走廊，大概可分兩大類：第一類是政治上的走廊（Political Corridor），這是人為的走廊，不是天然的走廊。例如「波蘭走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導火線，但是波蘭走廊的產生，完全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間的協議。在自然環境方面毫無依據。一旦國際形勢改變，這條走廊即隨着國際形勢的改變而消滅。第二類是地理上的走廊（Geographical Corridor），由於高大山脈的束縛，甲乙兩地的聯絡，僅能依賴一條狹窄的天然孔道，其兩側山地不易通過，類似這樣的形勢，即可叫做地理的走廊。世界上有許多地理的走廊，例如美國東北部有一條東西向的走廊，名曰摩哈克谷地（Mohawk Valley），南北兩側都是崎嶇不易通過的山地，紐約與五大湖區間的往來，多半經過這條走廊。法國的梭恩羅尼河谷（Saone-Rhone Valley），是中歐西歐與地中海西部往來必須經過的一條走廊。希臘境內的瓦答爾摩拉瓦走廊（Vardar-Morava Corridor），是中歐東歐與地中海東部往來必須經過的一條走廊。以上幾條都是世界上有名的走廊。甘肅走廊是一條地理的走廊，但與以上所述的幾條走廊來比較，格外顯得重要。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甘肅走廊是由中國內地去西北的唯一交通孔道，此外並沒有第二條可行的路線。在走廊以北的寧夏省，是一片大沙漠，不能通過，在走廊以南的青海省，一部分是巍峨高峻的祁連山地，一部分是荒涼無比的柴達木盆地，也沒有一條可以通行的正路。因此，新疆省與內地的聯繫，只有依賴這條甘肅走廊。反觀世界上其他的走廊，都有一些輔助的路線，不似甘肅走廊的孤單。例如西歐與地中海的交通，除經過梭恩羅尼走廊外，尚可取道格羅內（Garonne Valley）河谷；東歐與地中海的交通，尚可取道韃靼海峽；紐約與內地的交通，尚可取道薩斯克哈那（Susquehanna Valley）谷地，而甘肅走廊以南直至希馬拉雅山脈，長約一千五百公里，均為大山高原；以北直至杭愛山，長約千餘公里，均為沙漠地帶，南北兩方面均無東西向的通路。換言之，寬逾二千五百公里的地面，僅中間有一條通路，似此孤獨性的走廊，在世界上實在沒有第二條路線可以相提並論的。第二、世界上任何走廊，距離都很短。梭恩羅尼走廊長僅五百公里，瓦答爾摩拉瓦走廊長僅四百公里，摩哈克與哈克孫走廊合計不過二百五十公里，而甘肅走廊東由烏鞘

嶺，西至甘新邊界，長約九百餘公里，若由蘭州作起點，西至猩猩峽，長達一千一百公里。若由西安經甘肅走廊而至塔城，長達三千公里，此為中國通西方之唯一交通路線，亦為世界陸路交通中之最長孔道。明乎此，而後方可論及甘肅走廊的重要性。

甘肅走廊位於甘肅省的西北部，南北兩側排列高山，中間夾着一條縱谷，形勢天成，為一非常完整的地理單位。在世界區域地理中，有所謂「屬區」（Genetic Regions）者，有所謂「特區」（Specific Regions）者，甘肅走廊正是一個標準式的特區，在全世界中，並沒有第二個地方類似甘肅走廊。

甘肅走廊的範圍，東起烏鞘嶺，西至甘新邊界，長約九百餘公里。南以祁連山脈與青海省分界，北以合黎、龍首、馬鬃等山脈與寧夏分界。祁連山脈是一條綿延不斷的高大的山脈，所以走廊的南界很明顯。合黎、龍首、馬鬃等山脈時斷時續，高度又低，所以北界不如南界顯明。走廊的寬度，各部不同，西部最寬，約四百公里，東部次之，約三百公里，中間最狹，僅有五十公里。以經緯度而論，甘肅走廊東西約包括經度十度半，由東經九十三度四十分至一百零四度十五分。南北約包括緯度五度半，由緯度三十七度十二分至四十二度四十分。此種位置恰在中國東西兩部的中間，而中國的幾何中心，即在甘肅走廊的東部，所以甘肅走廊正似一條橋樑，將我國西北半壁與東南半壁作一緊密的聯繫，其形勢的重要，可以想見。

甘肅走廊包括十五縣及一設治局，由東向西，計為古浪、武威、民勤、永昌、民樂、山丹、張掖、臨澤（以上八縣屬第六行政區）、高台、酒泉、金塔、肅南所謂之河西區域，包括十七縣及一設治局，除上述十六縣局以外，尚有蘭州西北的永登及景泰兩縣，因其在烏鞘嶺的東側，屬黃河系，與烏鞘嶺以西的內陸水系不同，故不在走廊範圍以內。茲將各縣的面積列表如下：

縣名	面積（方公里）	縣名	面積（方公里）
古浪	三、〇一七	武威	七、〇四七
民勤	九、五五五	永昌	一一、一二三
山丹	六、一三六	民樂	一、五五三
張掖	三、七一一	臨澤	二、三六二
高台	六、一三五	肅南	一、五八四
金塔	八、五〇一	酒泉	八、七五一
玉門	一五、〇六二	安西（包括肅北）	三三、五二一
敦煌	六四、一七八	共計	一八三、二三七

走廊以往的重要性

甘肅走廊在我國整個的發展過程中，具有兩種作用：第一為屏障內地，第二為文物交流。

①**屏障內地** 我國立國最早的時期是夏商周三代，其建國地帶在汾渭河谷與華北平原，該時雖未產生國防問題，但其感受西游牧民族的威脅，却甚深刻。我國的統一局面，肇始於秦始皇帝，而整個的國防問題，亦正於此時產生。秦修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其目的在防止匈奴的南侵。匈奴此時已為東亞大國，據有蒙古沙漠及草原地帶，因感到牧草的不足，時向水土肥沃的中原進行侵略，但以秦代有堅強的防禦，不得已而西侵走廓。此時的走廓已為大月氏民族所盤據，匈奴逐大月氏而取其地，於是南自祁連山脈，北至蒙古高原，均為匈奴的牧地。秦代雖統一中原，但勢力並不強大，對於匈奴僅能採取守勢的防禦。西漢時代，中國國力漸強，匈奴內侵亦日亟。武帝即位，始決心驅逐匈奴，一方面派遣精銳的軍隊，痛擊蒙古地方的匈奴，一方面進佔甘肅走廓，截斷匈奴的右臂，中國的國力，由是伸入西北。甘肅走廓西接新疆塔里木盆地，所謂西域諸國，大多在此盆地內。以匈奴聲勢強大，此等小國均受匈奴的支配。但此等小國與匈奴並非同族，懼於匈奴的聲威，不得不暫時屈伏。一旦獲得外援，即可脫離匈奴的羈絆。漢武帝瞭解這種情形，乃派遣使者用外交的方法聯絡這些小國，使其內附。此舉不僅減削匈奴的臂助，亦可擴大漢族的聲威。武帝能擊敗匈奴以安定西北，由於他能控制甘肅走廓截斷匈奴右臂的緣故。匈奴所以失敗，與甘肅走廓的喪失不無關係。以後漢代的國威遠播西域，也是因為他們能利用走廓作為發展的基礎。由此而論，甘肅走廓在屏障內地鞏固西北的一方面，曾表現為一非常重要的角色。

甘肅走廓正式歸入中國版圖，始於漢武帝。在西漢的初年，匈奴逐大月氏而得走廓，派昆邪王駐在張掖，又派休屠王據守武威。漢武帝元狩二年，春三月，驃騎將軍霍去病大破匈奴，過焉支山，收休屠王的祭天金人，虜其太子。秋，匈奴渾邪王（一作昆邪王）殺休屠王，併其衆來降。漢以其地為武威酒泉二郡，由是中國得佔有走廓。武帝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二郡之地，置張掖敦煌二郡，河西由是分為四郡，並徙內地的人民以充實走廓。

甘肅走廓自為西漢佔有後，即積極的開發遊牧區域一帶而為農業區域。提倡農業最有力的一人是崔不意。他是濟南人，武帝時來到敦煌郡，為漁澤障尉。他在任期以內，常常教民耕田，敦煌的農田由是發展。到武帝元封六年，他因為提倡農業很有成效，武帝將漁澤障改為效穀縣，而以崔不意為縣令。敦煌郡的農業，因為有崔不意的提倡，得有迅速的發展。敦煌郡在走廓的西端，若西端發展農業，則其餘的部份亦必發展農業，大月氏及匈奴時代的遊牧社會，至是進為農業社會。

甘肅走廓是一個不易防禦的地帶，南側常常受羌族的襲擊，北側常常受胡騎的威脅，不易防禦。雖則不易守衛，但它是中國西北部的重要地區，不能守走廓，則西北半壁必然動搖，而內地亦將紊亂，所以守走廓是安定西北屏障內地必要的一着。在民元以前，中國建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但政府能積極控制

走廓安定西北者僅有四個朝代，即漢唐元清。漢唐兩代為漢族主政，經營西域最力，對於走廓的建設亦最注意，元清兩代為蒙古族及滿族主政，對於走廓的建設亦均採取積極的政策，所以漢唐元清四代的版圖都甚偉大。

②**文物交流** 甘肅走廓是中西文物交流的大道，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極密切的關係。在史前時期彩陶文化無疑的係由西方輸入，甘肅省內所發現的陶器文化與中亞及西南亞的陶器文化，多有類似。陶器文化經過甘肅走廓輸入陝甘寧青等地，所以走廓在史前期對於文化的輸入，已有相當的貢獻。漢唐時代曾由西域輸入宗教文化及多種物產，中國物產由是趨於複雜，而思想界亦發生劇烈的變化。中國的絲綢及以後的瓷器，亦曾引起西人的珍視。甘肅走廓對於中西文物的交流，的確發生了極大的作用。自張騫勇敢的「鑿空西域」以後，甘肅走廓在中西貿易方面一度為世界著名的絲綢大道（Silk road）。昔日敦煌在進出口方面的重要性，不亞於戰前的上海。由敦煌西北行，經吐魯番而至準噶爾盆地以通中亞，是謂北路；或由敦煌西南行，經姑蘇而至疏勒，是謂南路；或由敦煌西行經樓蘭、尉犁、庫車而至疏勒，是謂中路。中國的商人將貨物運至敦煌，西域的商人再由敦煌採購而西運，所以敦煌成為甘肅走廓的西大門，敦煌千佛洞的壁畫特別豐富，與進出口人物的衆多不無相當的關係。在海運開通以前，甘肅走廓對於中西交通的重要，不啻現在的蘇彝士運河。

走廓今後的重要性

走廓今後的重要性，可分兩點來說明：第一、為國內建設問題；第二、為國際交通問題。在國內方面，西北半壁與內地的聯繫，仍然依賴甘肅走廓。新疆一省的面積約大於十六個浙江省，孤懸在西北。新疆省與內地的關係，好似一個大風箏，甘肅走廓類似一條風箏線，這條線一朝割斷，風箏的命運，不難想像。中國具有風箏類型的區域共有兩處：除了甘肅走廓與新疆而外，尚有北寧鐵路與東九省。現在東九省與內地的聯繫，僅依賴一條北寧路，形勢亦甚孤立。但北寧路之外，尚有兩條輔助線，一路通過熱河，一路通過渤海。至於甘肅走廓以北的阿拉善與額濟納，均為沙漠區域，不能建築公路。以南的青海盆地與柴達木盆地，受祁連山脈與阿爾泰山脈之阻，亦不易修築鐵路，以是甘肅走廓的價值，益形加重。建國的根據地在西北，而建設西北的根據地又在走廓，這句話的正確性是不容人否認的。近年來政府已漸瞭解走廓的重要，舉凡公路的建築，礦產的開發，水渠的興修，林木的推廣，在在均足以表示走廓在建國期間是一個重要的區域。若從國際交通方面來看，走廓將來的發展更有希望。遠東與歐洲的往來，以前僅有兩條路線：一為繞經印度洋的海路，航行時間較久，約需月餘。一為繞經西伯利亞的陸路，由海參威到列寧格勒，特快火車約需九日半。將來隴海鐵路若由天水延至塔城，則此路不僅為東亞與西歐往來的捷徑，且更具高度的國防價值。際茲反攻復國前夕，僅憑有限資料與記憶所及略書所見如上。

漢人對西域之經營及西域文化

羽田亨 著
宋念慈 譯

漢族文化對西域何以影響並不顯著

中國自漢代以來，雖歷朝均從事於西域之經營，而對該地亦有極深之關係，然其文化並未顯著地光被西域且予當地人以影響的情況，前文業經約略述及。這種情形一見之下也許稍感奇怪，可是自古以來，踞居於此地之人是已有相當發達的文化的西方系統人，另一方面中國對西域的經營，也並不怎樣實際徹底，如果瞭解了這些，也就思過半了。前文已經說過，西域人自古以來即已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流脈。凡是文化已經發達到了某種程度的民族，它之所以要新受別種文化之影響，而轉變其性質方向，這種新的另種文化，或者是特別優秀，或者是迫於政治經濟等的不得已情形，才有經常發生的可能，如單是為了好奇，則僅能發生末流些細的影響，不能給予大的躍動，中國文化是既古老而又優秀，這已無待煩言，可是若把它和西方文化相對比時，我認為漢代以後的西域人，並未存在着必須突然間捨棄他們固有文化，而遷就於漢族文化的優劣之差。不僅如此，假如我們若再想到漢族文化自古以來在宗教和美術方面，或在其他各種科學方面，都有許多是由於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才發達起來的事實，那麼也可以說西域文化也並沒有必然走向顯著漢化的道理。現在我對漢代以後歷代相承的西域經營在實質上何以並沒有達到使當地文化轉向的程度，在此稍作較為深入的研究。

漢代的西域經營

漢自武帝經營西域以來，雙方之關係遂趨密切，各國之中甚至有向漢納人質而發誓歸順者。這種情勢直到昭帝時仍在繼續發展，而在宣帝時它的進展程度更為顯著，神爵二年（西元前六〇年）派鄭吉為西域都護，設治於現在庫車附近烏壘城，因之這一地方便完全被置於漢朝德威之下。自鄭吉以後，在前漢時期中所派的西域都護有十八人之多，在長時期中實行統治西域，未稍變更。王莽篡漢以後，對外方針因犯有錯誤，故西域諸國完全離叛，雙方關係據一般所知，至後漢明帝時完全斷絕，實則，即在王莽時代，當初也沒有到完全絕緣狀態，譬如龜茲便是直到王莽死時仍是操在都護李崇手中的。後漢光武帝的一代，乃又重新着手，永平十七年（西元七十四年）再置西域都護。至於後漢一代之中的西域經營，即一般所習知的三通三絕之說，要之，漢室是時時閉鎖着關門，採取斷絕往來的態度，可是自從廢止都護以來，許多時候仍遵從這一經略方策，設置西域長史一官以從事西域的經營。前面已經說過，即在後漢以後的時代

，無論統一北方的人也好，或在西邊建國的人也好，都是採取的同樣方針。而這種方針。就這樣轉移到了隋唐時代。

統治西域的真相

也許有人以為都護和長史之流既然帶領着部下從屬擔當督統之責，所以可以認為在政治上也就是徹底地被漢人所支配，但實際上似乎並不如此，從屬僅止於是從屬，漢人並未深入於實際上的統治，僅是預防使這一地方免於被有如匈奴的北方民族所佔據，且保證漢土與葱嶺以西各國之間的交通，使貿易免除障礙，即已達到目的。現在從西域考察所獲的文件，以及從歷來的紀錄看，都可以明顯地看出漢族是在當地徵募土著士兵服軍務的，而在組織軍隊時除幫助其給養之外，至於像在這產物缺乏的區域課重稅、求利源，則並不是它的方針，在這一點上是和北方民族之間有着顯著差異的。西域各國經常希望仰賴於中國歷朝的重要原因之一實即在此。因為被置於北人勢力之下時，則將使向未沐浴天惠的他們，會更遭受苛酷的誅求，因此假如沒有特殊情形存在，他們是希望務必能從屬於漢土勢力，而遠離北方之支配的。因為漢人經營西域之目的如此，所以他們只要達到這一目的，那麼他們便沒有染指於實際政治之必要。因之直接擔當此項任務者，皆為當地之人。試觀漢書西域傳所列西域官吏的名稱，各國均有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侯、王之稱，這就是說，自漢以來，是以此等官爵任用西域人並給予印綬的，但決不是由漢人擔任這些官職的(1)。縱使有所謂都護、副都護及長史，或有漢人為其僚屬駐屯於此地，可是那也不是直接關係於民政方面的，無非是高高在上，督統西域人的官吏而已。尤其是在居住方面，他們似乎是另劃一個區域和西域人隔離起來，而不是雜居在一起的。那種情景我想就恰如現在在這一地方之有回城，亦即在土著街市之中，另劃一個漢人居住的街市是同樣的道理(2)。因此，即使在都護的支配之下，直接的一切政治工作，悉數都是由西域人自行處理的，這與未受支配之時，幾乎並無差異。這種現象不僅在漢人支配西域方面為然，即在經營漠北地方亦莫不皆然。如果更就阿拉伯經營東方等方面尋求實例，便可知道在初期也是約略有同一情形的。阿拉伯人最初經營俄領中亞以及其東方時，他們認為僅從屬於它，便已滿足，所以決沒有進入其政治內部。惟俄領中亞地方自昔即為商業發達之地，乃財富集聚之處，所以阿拉伯人只是努力於從那裏徵收多額的租稅，只要達到這項目的即已滿足，而漢人在這貧弱的西域地方即使想要滿足這種慾望，也並沒有得以達成。他們在這方面雖然沒有成就，可是在獲致防止北人入侵之根據地，以及保證西方通商道路之

安全上，却得到了滿足，這是兩者僅有的差異。

清代的西域經營

現在中華民國仍舊承繼着前清的行政區劃，把這一地方納入新疆省之中，交給省政府管轄而清朝在這裏施行省政，直接處理政治事務，其歷史並非久遠，實際上乃自其末期的光緒八年，方在今省政府所在地之烏魯木齊、即迪化設置巡撫，配屬於甘肅總督之下，光緒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乃置新疆省。在此前的乾隆二十四年（公元一七五九年）會剿烏魯木齊以東之地置州縣，使隸屬於甘肅省，原來並沒有及於以內各地，它也與內地有別，將其劃入稱為藩部的區域之中，列於特別制度之下，在統治上一切均從舊習。至於改而敷行省治，主要還是由於左宗棠的意見。他在意見書裏說，若不革除舊俗，使其感化中華之風，則此地不能長治久安。由此可知清朝雖早已使西域地方從屬中央，然該地當時猶在中國文化圈外，其政治組織也和歷來並無特殊差異。所以若說中國古代統治西域大概與此類似的看法，或無大差。因此，即使將其置於省政府的管轄之下，直接受其政治支配，革新舊俗，以使之同化於中國文化的方針加以治理之後，在兩種文化之間仍有差別，在此當然無須把中國文化所能及於當地的影響程度，一一加以例舉，而其語言、文字、宗教、衣、食、住等項生活方式，均不相同決無顯著同化之事。關於這一點，我想應該重視在此地行之甚久，且形成爲當地文化根基的宗教，即由回教而發生出來的勢力。在政治上雖然已有了這樣的密切關係，仍未能在其文化之上結下同化的果實。何況在它的統治關係並沒有像清朝以後那樣密切的古代，若單從它已經從屬於漢土的關係說，西域文化實在並無應遽而顯著漢化的道理。可是，基於我們在前文裏所看到的關係，西域文化多少總也受了漢文化的影響，似已無待煩言，因此可說其所受影響的程度，大體上大概可以承認是依中國在西域統治關係的深淺粗密的程度爲比例。縱令今天仍未見到顯著的同化之實，可是我們必須知道自清末以來以迄今日的情形，漢族文化之光被西域並給予影響的時代，實爲古來所少有。在經營西域方面僅僅可以與之相提並論者，在時間上長而實際者，唯有唐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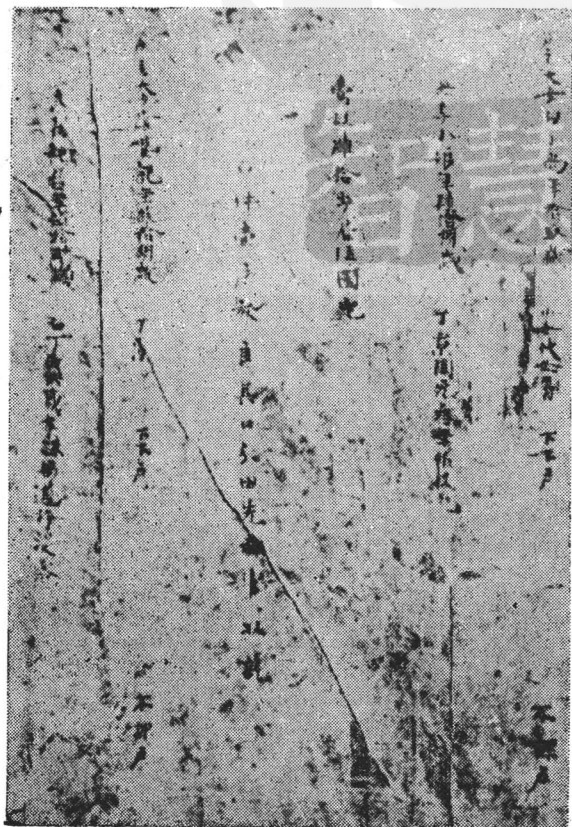
唐代的西域經營

唐代早在貞觀四年（公元六三〇年）即將西域東端的伊州，即今哈密之地收歸版圖，十四年討滅麴氏所建之高昌國，接着又征討焉耆、龜茲等地，受降疏勒和于闐，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最初在高昌），以資統轄。自高宗起至則天武后和玄宗時代，對西域之經營愈益進展，把從太宗時代開始的制度，逐漸擴展，乃在西域一帶進而設置州縣。因此唐代攻力之所及，不止在此所謂之狹義的西域區域，自太宗時代起即已勢入現在俄屬中亞地方，曾被阿拉伯人滅亡

的波斯薩珊（Sassan）王朝的遺嗣，也到了企圖依賴唐朝以恢復社稷的光景了，玄宗天寶十年（公元七五一年）唐與阿拉伯軍戰於俄屬中亞的達拉斯 Talas 河畔，唐軍大敗，自此唐朝在西陲之勢力遂日趨衰弱，更加自天寶末年發生安史之亂，因之更無餘力向外伸張了。復以夙與唐朝爭奪西域之吐蕃的勢力，日益強盛，純於德宗時代即公元八世紀之末葉起，勉強在支撐着的龜茲安西都護府也終於陷落，終至不得不完全將西域放棄。但是我却認爲自太宗時起長達一百五十年期間，次第設置諸州以事統轄的唐代西域經營，乃是相當實際的。

有關唐代統治西域的幾點文書事例

若單從史籍上的總括記述，而想把握它的真實情況自屬困難，但若依照在西域考察所得到的各種文書加以考訂時，就可稍能窺知其真象了。例如代宗大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管轄于闐附近傑謝地方的唐朝官吏自丹丹威立克（Dandan Ulug 在和闐東北方）致送于闐王的公文(3)被發現以來，因之對當時管轄的一般情形有了了解。從這一公文的大體意思看，是該官所轄地方的百姓們用土語上了請願書，翻譯的結果，得知他們說頻年遭遇賊害，蒙受損失，故移住於于闐。因此滯納上月在前住地所應繳納的租稅，例應於今年秋收之後繳納，然應收穫之糧食均在前住地，故請將租稅一概豁免。可是因爲這是不允許的，所以在給他們的公文上說應該前往該地收割運回，又在同一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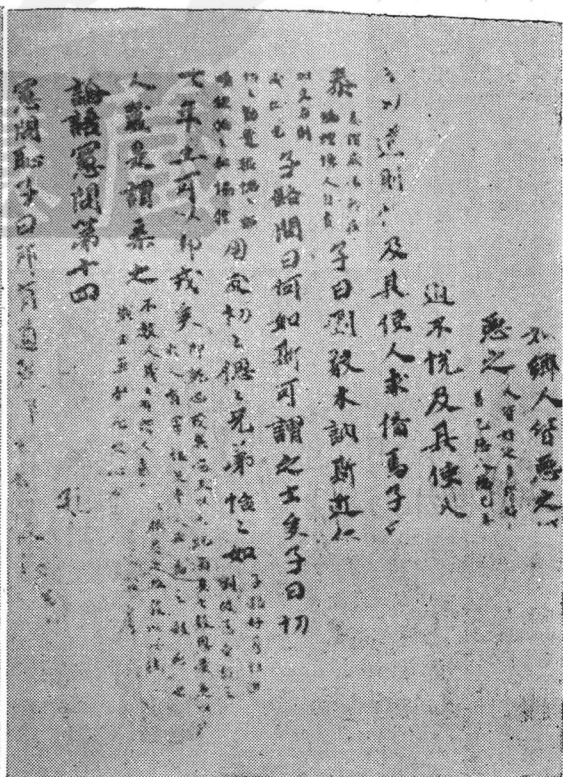


第十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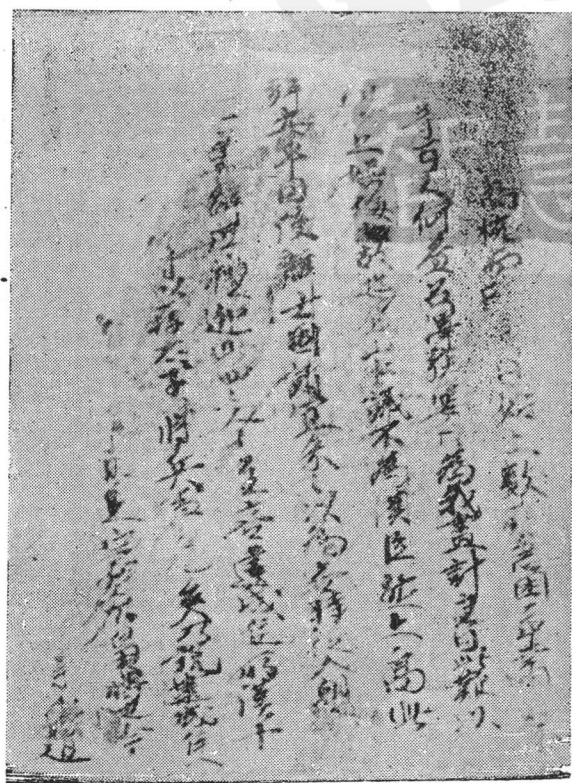
點所獲得附有大曆十六年（公元七八一年）二月日期的傑謝地方名叫思略的人，在其漢文呈文(4)中說：當地語言的書記二人與思略之間，曾有驢的買賣，因買賣的書記不付價款，故懇請予以處分，而且在這件公文上還明記着是由告訴人口述而由他人代書者。這一文書當然是向唐官訴諸裁判的，又從思略這人是傑謝的百姓看，他或許是當地的土著。此外在庫車發現的大曆九年二月月的漢文文件(5)之中，記載着一個被認做是土著人民的名字，因家貧喪母而無力殯葬，請求救濟的意思。從唐官對此類瑣細事件都要處理的情形看，可知他的管轄決非止於名義，而是甚為實際的。

多數唐人居住西域的證據

唐朝在這一地方實際實行政治的結果，益使唐與西域的關係臻於密切，因之西域人之往來於唐土者，亦愈益加多，故隨着漢人之進入這一地方而永住者，也逐漸增多起來，這是不難想像的。在西域發現的史料之中，曾發現好幾通高昌的交河縣，或在其東方、相當於現今吐魯番的柳中縣等官署經過調查蓋印的唐代戶籍斷簡。據中村不折氏所藏開元四年的籍帳（第十六圖），從它在背面所蓋的印信，可證明它是柳中縣的調查。在這文件上列記着各戶戶主家族及其年齡、附以等級、明定課租稅之戶和不課之戶，又記載着永業田地、居住園宅等之段別及所在，這就成為把唐朝內地制度原封不動地帶到該地實施的證據，也可藉以知道州縣分置治理這種史籍記事之決非空文，以及永住之漢人為數不少等情形。據新自敦煌發現的玄宗開元十五年自印度朝聖返回龜茲的慧超旅行記(6)「往五天竺國傳」，當時在龜茲、疏勒即伽師祇離（今喀什噶爾）、和于闐，都有由漢人和尚擔任住持或當家掌院的廟宇，就中也有生於龜茲的漢人名僧，也有由帝都長安前來的高德。據新出的史料可知德宗建中時代，在上述的丹丹威立地方也有漢人的寺院(7)，此外還有一個日期看不太清，而認為是與此時代相近的文書(8)顯示，在于闐東北方的馬札他格（Mazharag）也有唐寺，並住有很多唐僧。這種寺院在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現被發掘者乃其中極少的一部分，且提供了有關文件而已。在此等文件之中特別有趣者，就是某一寺院的和尚也像在唐朝內地所實行的一樣，把金錢貸給俗人而收取高利(9)。此前在唐太宗時代，西遊的玄奘(10)曾記載說，在東端的伊吾，即今哈密地方，有一所三名和尚居住的寺院，其中一人見玄奘，哀號着說，想不到今天還能遇上唐人。此外，看他在此以西各地對此等寺院及和尚再無任何記載，這種情形大概可以認做是自此以後的時代，逐漸發生的現象。在此以前很多的西域和尚來到中國內地，住於寺院之內傳法，至此形勢逆轉，很多的中國和尚進入了西域，長期居留斯地從事於教化工作了。這種逆流之所以出現，固然可以被認做是由於唐朝經營西域的發展，隨着一般人民之移動而發生者，這從東方佛教史上說，亦為一極堪注意的現象，即從中國文化對於此地的傳播看，也是相同的。



圖七十第



圖八十第

西域出土的唐代文化遺跡

在前文裏關於從此地出土的漢與六朝時代的中國文獻，已經概略地講過，至於唐代文獻，其數量與種類都加多起來。各宗派佛經的增加自不必說，即自經史詩文之斷片起，乃至道教典籍，莫不具備，而其出土地點又廣泛地及於各方。第十七圖爲日本橋氏在吐魯番附近之吐峪溝（Toyuk）所獲得鄭玄註釋的論語斷片，第十八圖也是他在龜茲附近庫木吐喇（Kumtura）所獲得的漢書張良傳斷片，在其另一面上則記載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西域考古圖譜下卷經籍之部所載）。我想這都是唐代的手抄本。像這種從各方面發現古代手抄的諸種典籍一事，即足證明沐浴於唐朝熱鬧文化的僧俗等人是如何遍布於西域諸方了。這較之在此以前僅由屯戍軍或少數官吏和這一社會之間並無特殊深厚關係的駐屯，在中國文化所給予西域的影響上真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在美術方面，中國美術家所畫的圖畫，其在西域所流行的明白證據，不能溯到唐代以前。而在這以後的時代裏，也發現了不少在紙張、絹、麻布、木板或在牆壁所畫的繪畫，也有書寫唐代年號的，即使沒有年號，從其畫風和共存物，或自畫面上所書寫的字體上，也可以無疑地證明是這一時代的作品。其中多數作品是佛像畫，然也涉及風俗畫和人物畫，在佛畫之中也有用和西域樣式顯有差別的描法，畫出具有風景樹之類者。第十九圖所揭載者是自吐魯番附近的木頭溝，（Mutlock）



第十圖

所發現的絹本佛畫像的斷片，從字體、共存物等之關係，可以認出是屬於唐代的東西（西域考古圖譜上卷所載）。而尤其被人認爲珍貴者，就是這些畫統都是用墨水畫成的，這種奔放雄勁的墨畫已經在這時實行一事，在資料上實在表示着既重要而興味深長。圖版第十及第十一是斯坦因自高昌附近阿斯塔納地方古墓所掘出的絹本繪畫斷片，據畢尼翁（Binyon）氏意見，那似是用於承塵那種地方的裝飾，堅約一尺七寸五分，橫着是長的絹地。這畫是用薄的錦欄（金線織花的錦緞）做成框子，隔成幾個長方形，在區劃之中畫成功。從那所畫的滿開的花、綠葉、飛鳥、持樂器的少女和羣集的美人等情況來看，那似乎是畫的春日野遊。畫的時代雖然不能清楚地判定，但從畫風上看，不僅毫無疑義那是唐代的作品，而且從它的共存物來看，斯坦因說它是神龍、開元時的作品。尤其引人興趣者，它的畫風固不必論，至於此等美人的豐滿的容貌，髮型，假粧，衣裳樣式以及姿勢等，恰和日本正倉院的樹下美人屏風，暨聖德太子像的圖樣，傳到日本來的這些繪畫極爲酷似，由這種關係更能確認它們之近於唐代，實在從來想像之上，這正如畢尼翁氏所說，確是一種有趣的事情。在許多佛畫之中，製作年代以及供養者的姓名，都用漢文記載的非常明白，還有不少是上部畫的佛畫，而下部則係畫的供養者之像。這些供養者的像，自然是畫的中國樣式



第十版自阿斯塔納出土的唐代風俗畫

，而在畫佛或菩薩以及其他景物時，也有把它們畫成極為醒目的中國畫樣式，這就是屬於由西方傳來的佛畫描法經漢人消化之後，在他們的佛教美術方面特別加上一種趣味和手法，而形成了一種混合美術樣式。圖版第十二所揭載的附有代宗大曆六年四月十八日期的吐峪溝出土佛畫，即其適例。

中唐以前西域文化漢化的程度

唐代在這種情形下，尤其在中唐時期有多數漢人廣泛的進入西域，在那裏定居，並過着社會生活，有關學術、宗教、美術以及其他各種遺物都有留傳到現在的。那麼，具有這樣文化和西域人接觸的他們，將給西域本來的文化以何種影響和感化呢？換言之，由於兩者當時在這一地方的接觸，西域文化究竟漢化到了什麼程度呢？上面我所以不憚煩瑣地概述了唐代在西域地方的統治和文化遺跡者，一方面是傳述這一事實，但同時也實在是爲了暗示這漢化的程度是應該相當顯著的。可是奈何迄今爲止僅依所得的資料，以及研究這些資料的結果，可說尚未能達到對此點能夠充分證明的情況，某些漢文佛經，曾經譯成索固特文字，這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根據這點似乎可以找出來認爲是足以使中國佛教(4)影響西方的資料，可是這並不是因爲唐朝佛教倒流於西域而發生的，反之却是在唐都長安所實行的事業。關於各種工藝品，例如紡織品的出土於西域者，雖然也有得以看出中國與西方兩個系統相互融合之點，但是它們並不像是在這地方製造的。在千佛洞裏雖然有古留恩威德爾氏和魯柯克氏以及一般認做是具有唐人手法之特徵的繪畫，不過那也難以認定它就是真傳唐人手法的西域人之製作，我想它乃是唐朝藝術家在此所遺留的筆跡。類似將唐的學術文學翻譯成西域語文的東西，似乎還沒有發表過。這樣並列之後，或者也可以說漢族文化在這時代對西域人的影響是意外地甚少，他們並不同化於當地漢人的文化，却依然吸收着西方文化之流。但是假若使一般的思考法則也能適用於當地，那麼我們也就不得不承認漢人這一時代在西域的發展，至少比在此以前的時代實行了使西域文化更爲進一步的漢化的工作。從現在仍屬於尚在研究中的、或將來可能獲得的許多資料之中，相信大概對於這點是可以到某種程度獲得證據的。總之這一問題之解決，只有俟諸將來了。

晚唐以後西域文化之漢化

迨到晚唐以後，當地住民間中國文化的色彩逐漸加深，或出現了足以實證形成融合東西系統的文化資料。若將這種情勢和前面所說者一加對照，也許你在一見之下甚感奇怪，其實沒有一點不可思議的地方。因爲使這種情勢出現的當時的西域人，已經不是屬於到中唐時代的西域人，亦即不屬於依朗民族系統的種族了，而是自唐太宗以來，尤其自玄宗時代起一連發生的安史之亂以來，具有極爲密切關係，且無自己特有的進步文化，同時對西方和唐朝文化又非常親近並爲土耳其民族之一部分的回鶻人(Uigur)。這種回鶻人之出現於西域，自種種意義來說，是一件極爲重要的歷史事實。下文我將進一步對它加以敘述和研究。



圖版二十吐峪溝出土大曆六年佛畫



圖版十一阿斯塔納出土的唐代風俗畫

參考書

- (1) 漢書西域傳末段。
- (2) 參照徐松漢書西域傳補註，烏魯條。
- (3) Stein Ancient Khotan I. p. 523. 傑謝的傑字，在下列文件裏也同樣有一記載，但此字原形是難讀的，沙曉解釋這一文件，認其即為傑字。類似字形有榮、傑等可資參考。
- (4) Ibid p. 526.
- (5) 西域考古圖譜下卷，史料之部(10)之(1)。
- (6) 羽田 Pelliot 合編，收入敦煌遺書中，參照藤田博士箋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河曲藏區行腳

張紫桐

一小引

生長東海之濱，自幼兒愛讀遊記文章，嚮往飄忽的雲遊生活。很早的時候我就發願：長大後要做一個旅行家，像一隻矯健的燕子，來去江南塞北。畢業後投身地質調查工作，度着極頂忙亂的跑碼頭生涯，浪跡南天北國，把漫長的歲月消磨在荒漠的原野裏。就這樣，六年過去了，實現了十幾年渴望的宏願，同時也體會了孩提時代的幻想，旅行家的味道原來如此！

地質調查工作是辛苦的，天南地北，山嶺水涯，終年奔波在寒風僻野；曉行夜宿，饑餐渴飲，天天在忙亂與幻想中流徙。但名山大川，予人以高遠之思，倍增愛國之情；古跡名勝，啓人靈感，緬懷往昔，瞻念前程，發人深省，奇風異俗，新奇的景象人物，擴大眼界，增加見聞。古人以「行萬里路」與「讀萬卷書」並論，旅行對於人生至少是與讀書看報一樣的重要。六年調查生活，步行三萬餘里，雖然吃盡苦頭，卻毫不厭倦，我留戀這種漫遊生活，今後仍要繼續下去，直至兩腿走不動了的時候為止。

二十五年春天，奉派調查甘青土壤，得到一次藏民遊牧區域內旅行的機會。這是甘青川康邊境上的草地高原，與四川的松潘草地相連，黃河自巴顏喀拉山的星宿海流出，到這平緩的地帶，蜿蜒曲折，拐了一個大彎，故有「河曲」之稱。從五月至七月止，在這片草海裏，我們有兩個多月的逗留，三千餘里的旅行，在馬背上，在帳篷裏，這兩個多月的生活是緊張與興奮而充滿了新奇的趣味。一直到今天，回想當時情景，總還常常盼望有機會能再去好好的玩上三年兩載，甚至放牧草海，隱居終身。

二 拉卜楞大寺巡禮

從蘭州西南行，兩馬站到臨夏，這是回民的中心，當代西北聞人有不少是

- (2) Stein. Ancient Khotan. p. 527
- (3) Chavannes. Documents Chinois. p. 206 seq.
- (9) 與(7)同。
- (10) 見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
- (11) 圖版第十及十一係據京都帝國大學所藏之模本。
- (12) Burlington Magazine, June, 1925. Stein. Innermost Asia. II. pp. 654-657.
- (13) Stein. Ibid.
- (14) Gauthiot J. A., nov.-déc. 1911, p. 957-8. Pelliot. Le su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II, VIII.

生長在這裏的。向西南，兩馬站到夏河，這是甘肅極西南境上的縣治，草地邊緣的都會，有名的拉卜楞大寺就在城西大夏河之陽。

拉卜楞寺始建於康熙四十八年，稱後藏三大寺之一，不但是藏民信仰朝拜的聖地，也是西北藏族文化的中心，聲教所被遠及新疆蒙古及東北各地，在我國佛教中的地位是煊赫的。這裏我不預備追溯它底歷史或組織，祇是談談大概的情形。能有機會參觀這所名震西北的大寺是幸運的，然而遺憾的是我對佛經的知識太少了，不單壁畫上的故事莫名其妙，就連那些偉大的塑像也不大清楚叫些什麼名字。

寺院建築富麗堂皇，碧瓦紅牆，金頂高聳，輝煌燦爛，巍峨宏偉，古代帝王宮室的內外貌想也不過如此，可是內部陳設却並不太複雜，這說明佛教的真義是莊嚴簡肅，不講鋪陳而注意潛修鍛鍊的，經堂中鋪幾排氈墊，為跏趺坐誦經之用；佛殿裏則全部給高大駭人和小巧玲瓏的佛像佔了。除去這些宏偉的經堂佛殿和「囊謙」——活佛公館——之外，四週更星羅棋佈着無數的小院落，都是喇嘛的宿舍，如果我們立在大厦河南岸山頭上俯瞰眺望，那些樓台殿閣，深院大宅，足可構成一座小城市，（我所經過的縣城，比這更小更冷落的，又何下三五處）金頂紅牆的宮殿式建築，真是別具風味。真的，就憑這些房屋，和裏面收藏的經典，更加上許多活佛教授，也已足夠成爲一所佛教的學府了。拉卜楞最高領袖為嘉木樣大活佛，像達賴班禪一樣，他是世界轉生的大佛爺，西北藏民崇拜之所依歸。寺內管教都有一定的章則規矩，講經說法的活佛也都是德高望重學問淵博的學者大師。喇嘛號稱三千之衆，據確實估計連各方遊學的在內，總數不下二千三百餘人，再加上附屬各寺院，它所擁有的圖書、儀器、建築、財產及教職員學生等堪與國內任何大學媲美而無遜色。講學術地位，拉寺在後藏要推第一，自嘉木以次，歷代許多活佛大喇嘛都有著述發明，談

到學風，也是首屈一指，一千多小和尚差不多完全是循規蹈矩孜孜不倦的好學生，它能獲得那麼多人熱誠的信仰，享如許盛名，誠非偶然。

喇嘛的生活，足當清苦二字，藏區規矩，出家入寺後其一切生活費全由家庭供給，此與內地習慣迥異，大多數的人整天吃藏糌，少數環境清寒的連酥油也不可多得，只有少數的人能常常吃肉。衣服襤褸，即嚴冬風雪時亦絕少着皮衣，似乎這也是寺內規定的。寺院週圍的那些小院落是他們的宿舍，出錢向寺方或某活佛租賃，或者是人情借來的，他們這樣各自度着單獨的歲月。日常生活是相當自由的，上課聽講和唸經禮佛之外，便各回宿舍細讀精究，野外閒散，市上踴躍，或到河畔柳蔭深處練習吹奏各種樂器。春秋佳日，帶着帳篷往山巔水涯郊遊小住，謂之「浪山」。總之，他們底生活是澹泊恬靜的，自由而不敢縱，不僅規章限制了他們，緊張的功課與嚴格的升級考試也決非馬馬虎虎可以過去的啊。

拉卜楞寺面臨滔滔奔流的大夏河，河南山坡上一片樹林，正對大寺，那是寺院自種的，大概也是取風水之意。草地裏每個寺院前面都有這麼一小塊雲杉林，蒼翠含烟，在那無垠的草海裏，為寺院增色不少。拉寺門前濱河的廣場為市集，藏語「寵拉」，每日清晨，商旅雲集於此互換有無，松潘茶、鼻烟、麥子、麵粉、藏糌、牛奶、酥油、皮毛、馬、牛、羊、布匹、柏樹枝（作香焚）、佛像、珠寶、貝殼、手飾等等，一切日常用品，應有盡有。在這裏，可以看到英國繩子，印度琥珀，西藏蒲羅，和一些精緻考究的雕刻。鈔票至此完全失去效用，因為他們不認識漢文，一切交易都靠累重的硬洋與銅子。

圍繞寺院四週是一圈走廊樣的小屋，裏面挨列着許多「哥拉」；這是牛皮蒙的圓筒，內藏經典外漆紅綠花紋，中心貫以鐵軸，按插於上下兩橫樑中，推動旁轉，其功等於誦經。每天都有千百善男信女來此推轉這些「哥拉」，不少人帶上皮手套以免手痛，其為數之多可以想見。藏民識字者少，佛經又極複雜，不識字與事忙的人都無法唸誦，聰明人想出這種方法來替代誦誦。最簡單者為手搖式，銅製有軸的圓筒，上刻經文，放牧或引路時都可搖轉。或者將許多經典誠心虔誦後埋於地下，砌成石塔，繞塔而行，功同唸經。藏民往往在病災時許下繞塔數百或數千轉的願心，指鍋負糧而來，繞塔旋轉，餓時便在一旁煮飯吃，夜晚也就在一旁睡，直至功德圓滿為止。此外還有一種頂令人驚嘆的願心是繞全寺膜拜一週，二步一拜或一步一拜，偌大的拉卜楞寺，叩頭一轉所費的精力時間豈可想像？這，你不能不欽服藏民信仰的虔誠與偉大！

三 遊牧生活素描

地理上所謂「草地」，係指高度在森林線以上的高寒地帶，不宜農作，也沒有樹木，雜草叢茂的大草原，為天然之廣大牧場，河曲一帶的草地就是藏民遊牧的區域。

藏民生活的中心是宗教信仰，因此至今還在政教不分的狀態，統轄管理之權屬拉卜楞寺。他們並不似古卜西人那種原始的漫無目的地浪遊，而有相當嚴密的社會組織。遊牧藏區盛行家族制度，每一氏族成一單位；由拉寺派親民僧管理，三年一任，對寺院負責，稱為「哥拉」；下轄若干小村，各約十幾二十餘戶，有小頭目統領，族有大小，數百至千餘或二千多不等。

牛羊馬匹是牧民的財產，草地是牛馬羊羣所賴以爲生的糧庫，也就是牧民的生命線，所以領地都有清楚的劃分，每氏族有其固定牧地，「歐拉牧地」「闊才牧地」等等，就是指「歐拉」或「闊才」（譯音）族的遊牧地區；即使族內各小村落的放牧範圍亦有明確規定，不容越境，如有侵犯，便是一場流血戰爭，多少糾紛械鬥都是因爭草地而起的。

按照人類歷史進化的程序，遊牧是初民的一種生活方式，其唯一的特徵是簡單；草地藏民的生活，在這文明的世界裏，大概要算頂單純的了。從穿的說起吧：唯一的衣服是一件光板的老羊皮襖，沒有任何襯衣，無分男女老少，也不隨季節更換；長大而且沉重，為行動方便起見，拿腰帶把大部份攏束在胸背部，裸露右臂讓右袖拖掛背後以便做事；夜晚裹在身上，便是一床大被窩。雨雪天外單罩上一件更寬大的毡衣，風雪之夜，護送我們的番兵，在露天曠野裏冰凍的雪地上鋪下毡衣，裹着皮襖酣然大睡；而在帳篷內的行軍床上，厚厚的棉被裏倦臥着的我們，還大有不勝嚴寒之慨，瑟縮得連身也不敢翻動呢。

飲食同樣簡單，主要食品是藏糌肉類、奶茶，大概一日三餐，早午各進少量藏糌，晚上則飽餐一頓牛羊肉。所謂「藏列」，是青稞（稞大麥）炒焦磨的粉，北方稱為「炒麵」，南方叫「焦屑」的。食時先融化酥油於奶茶中，加適量藏糌，用手和勻後捏團食之，吃完後碗內須乾淨如洗，方算「行家」，至於羊肉，切成大塊，白水煮熟，（距離離的程度尚遠），吃時用小刀割開，沾鹽大嚼，稱為「手抓羊肉」，要骨頭啃得精光，才算本領。草地居民每多胃病，據說就是飲食太粗放的緣故。

住是帳篷，蒙古人多白毡的蒙古包，堅固避風，而攜帶則稍不便；藏民除喇嘛與「哥拉」用蒙古包外，一律牛毛帳篷，篷內四面用滿盛糧食和燃料（晒乾的牛羊糞）的麻袋堆堵做牆壁，中間砌灶，兩旁鋪毡，坐臥都在毡上，男左女右，也有上下之分。許多帳篷圍成一圈，中間廣場作為牲口的宿場。至於行，那是更不成問題，有的是馬，毛牛也可作坐騎，草地高原沒有高山峽谷，也沒有懸崖峭壁，雖無固定大路，但到處可走，十分方便。

談到遊牧，決不是我們想像中漫無目的地東飄西蕩，而有一定路線。冬天在山窪低處比較溫暖的地方休息；等春風吹化冰雪，蘇醒了百草之後，他們離開冬日牧地，各照預定的路線，順着河谷慢慢向高冷的夏日牧地上遷移，在水草豐美的地方逗留些時日，向兩旁山上放牧，這樣經過大小七八次的搬遷，夏日到達頂高的地方；秋後又漸次下移，在隆冬降臨之前，重又回到冬日牧地。

經過春夏長期的繁榮滋長，這時候牧地上的草高三四尺，「風吹草低見牛羊」，正是草地裏秋高馬肥時的景象。在這裏，他們將安靜地度過漫長的三冬歲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這樣自由而富有詩意，亦正是造物主偉大的傑作。在紛亂的都會中過久了刻板枯燥日子的人，對草地藏民們清苦的享受或許要綢繆與嚮往之情吧？

四 藏民風俗一斑

進入一個人物、語言、風俗、習慣都完全不同的生疎區域，我們必先多少明瞭一點當地的習俗，否則一定感覺很大的不方便或鬧笑話。譬如說吧：草地規矩，向水桶裏取水必須用杓而切忌用碗，因此事我們所帶的勤務跟寺院派來的衛士曾誤會到相打起來。入境問俗，正是旅行須知上的要目之一。

拉卜楞草原的地理背景既然與中原迥異，土著是游牧的藏民，語言文字，生活習慣，社會組織等等，自然和我們也完全兩樣。草地中除偶有的過往買販而外，絕少外界旅客，更無商店，故旅行草地的人必須備足糧食，攜帶帳篷鍋碗等一切用具，否則縱有再多的錢也解決不了食宿問題。

實在說，草地居民對於外來的人是非常歡迎的，因為他們的生活委實太平淡了，過着完全與外界隔絕的歲月，有如一池死水沒有紋絲漣漪。他們希望遠方的客人帶來許多新奇的消息和有趣的故事，雖然遠處荒涼漠野，沒有直接享受到政府的恩澤，却仰懷中央德威，尊崇領袖；凡中央來人，都被熱誠的招待，奉為「中央烘布」（烘布是藏語官吏的意思）。每至一族牧地，「哥娃」老遠迎來，讓入他底蒙古包裏，獻奶茶及酥油藏糕，殷勤寒暄，彬彬有禮。等我們自己的帳篷扎好之後，才回我們的帳篷內休息。這時就有婦女送水和乾牛糞來，和顏悅色，突問客從何處來，毫無差役勉強之態，給旅人物質幫助外，尤予人以興奮忘憂的親切之感。

游牧裏所謂「烏拉」制度，烏拉就是支差的意思，旅行草地的公務人員，帶着地方當局的文章，就可以隨地找頭人派牛馬送接。我們的隊伍連翻譯、副官、衛士、勤務共有十幾人，加上食品及一切用具等，行動都須馬牛三四十頭，另外需要派些番共護送，同時管照他們底牲口；他們既不取代價，並連吃的東西也各自帶來。所有這些支差的人都荷槍背劍，跨馬而來，沿途談笑笑，或引吭高歌，無不興高采烈，如自己旅行一般。夜晚席地而眠，不管風霜雨雪，答應你底事一定做到，不用操心，言必行，行必果，頗具俠客肝膽，而且勝任愉快，可是既達目的地後，再要勉強他多送一里也不可能了。他們就是這麼豪爽斷而毫不敷衍，不肯妥協的民族。

藏女的辮髮是一種驚人的奇觀，你簡直無法想像那是裝飾得多麼複雜、別緻！頭頂劃出一圈頭髮，分九股梳一大辮，其餘四週的結成無數小辮，頂講究

的每十來根頭髮就編一條，這許多小辮子分左右兩組一齊集攏到後面，並排齊整地繫在一塊長方的軟胎板子，板上釘滿飾品，可多至四十八枚銀洋，富有的用玳瑁、珊瑚，貧窮的則釘銅元貝殼，板下更掛一排大紅穗子，形成一個累贅的動物，頭髮不勝負擔，而不得不用線掛在腰帶上。環珮叮噹與盈盈笑語相伴，別有一種風趣。

草地藏民強悍尚武，愛跨馬荷槍，馳騁在草原裏；敢於單槍匹馬在草地旅行的人是有膽量有本領的好漢，人們豎起大拇指來喊「撒高」（藏語好的意思），男人們就愛趕着他們的牛馬羊羣漫山遍野的浪蕩，一切家務留給女人去做。

說他們野蠻固然是罵人的話，不過論作風，他們確實比我們更接近人類的老祖宗；我會親眼看見他們殺羊時，當刀子剛從咽喉抽出，熱血瀉射的時候，把嘴接上去吸血，吃生肉也是常有的事。帳居野處，茹毛飲血，你也許會笑話他們不文明，然而藏民體格健康，強壯有力，這却是咱們「文明人」望塵莫及的。

在草地游牧的社會裏，喇嘛是最高尚的職業。普通每一家庭除留一子接替香火，其餘的男孩就全送去當喇嘛，希望能有一子成佛，全家托福沾光，有時如果留下的孩子夭折了，嗣裔斷絕，那麼出家的兒子經相當手續後也可還俗。事實上，藏民對於生男生女倒並不太在乎，重男輕女的觀念似乎並不存在父母心中，女孩同樣有繼承權，又何況大部分的工作要待婦女去做呢？

草地裏雖沒有什麼法典或司法機構，但也有些共同遵守的不成文法規，譬如說殺了人用不着償命，而是抵償全部財產。當然這些規則未必盡善盡美，但祇要大家都肯遵守，也就可以相安無事，維持安靜的社會秩序了。

五 信仰性格與人生觀

走進草地帳篷，第一件令人注意的事，要算酥油燈光中的佛像與壁上掛的寶刀，以及裝有包銀腳架的長槍了。也許他們會給你不調和的感覺吧？然而形成藏族強悍、俠義、精神不苟的特質的，正是這種巧妙的配合。精靈與寶劍交織組成藏民的人生哲學——樂天知命剛毅悍悍；我們相信這結論大概不會差得太遠的。其實這並非奇蹟，歷史上許多原始頑強的民族不都是好鬪嗜殺，而同時又是狂熱的篤信某種宗教嗎？中古時代偉大的十字軍七次東征，雖說是野心政客的煽動，而其所以能發動那麼大規模的遠征，不就全憑宗教力量的號召嗎？

藏民把自己的兒子送出當喇嘛，帶了飯去吃，擔負寺院的賦稅，更把大部分資產獻給佛爺祈福消災；疾病愁苦，哀痛無告的時候，便乞援於神靈，叩首祈禱或請喇嘛誦經。如果你有機會參觀藏區的寺院，試注佛前地板上人們跪拜時所留下的深刻的手、膝及腳的印子會令你驚歎稱絕的。藏民一生最大的願望

是朝藏(到拉薩去觀光瞻拜)，大半世牛馬般地辛苦，積聚所得，朝藏一次淨光，甚至沿途乞來去的也頗不乏人。在草地裏，只要是到西藏去朝拜過聖城，洗去前世今生一切罪惡，建立了殊功，可以超升天國。入藏朝拜過的人，在社會上有特別地位，道分高，功德比普通人要圓滿得多，跋山涉水，風霜雨雪，從西藏回來的時候，衣破鞋爛，形容憔悴，鬚白髮長，像災區逃出的難民似的狼狽不堪；然而人們爲他(她)祝賀，慶賀他們完成了生命中的大功，用從心底裏發出的傾慕歡迎他，大家圍繞着他詢問西藏的情形，沿途的故事，充滿了激動的淚光，充滿欣羨的驚歎，像迎接前線凱旋歸來的戰士那麼熱烈，感動！

豪爽、直率、質樸渾厚得可愛，但也有時剛愎蠻強得令人氣惱；有雄邁的性情，有俠義的心腸，能路見不平，扶助羸弱，却不甘趨炎附勢。十來歲的男孩就腰懸寶劍，有糾糾武夫的氣概，慍慍好鬪是藏民天性，但如謂爲野蠻嗜殺，則殊欠公允。雖說沒有法律，缺少法治習慣，但秩序是有的，公理總是存在。冤家仇殺時有所聞，而蠻不講理的格殺無辜却是鮮有的事。機警、勇敢、大膽，精於騎射，天生具備了優良戰士的條件，但非侵略戰爭的製造者，雖然他們也從不規避戰爭。他們愛和平，但更愛自由，決不苟安偷生或貪生怕死像古代許多篤信宗教的民族一樣，仁慈博愛，但神之所惡，也不惜一戰，即使是戰敗滅亡，亦所不計。死在戰鬪的血泊中是光榮的，爲神而死，他將超升天國；射殺敵人的英雄，大家稱贊他，另眼看待。這種俠義的英雄崇拜，也很可以鼓勵知識粗淺的人從事冒險的嗜試。

人類社會中存在着一種矛盾的現象，同時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那就是慾望隨物質享受遞增，但生活情趣却反而遞減，人爲追求物質享受以廢其無窮之慾，終年辛苦忙碌，斤斤鑽營，奔走掠奪，甚至喪天害理不顧廉恥的殺人越貨，貪污舞弊；也許生活是優逸的，然而人類慾望絕不可能滿足，得隲望蜀，功名利祿，永遠縈纏心頭，精神老是緊張着，結果還是不能擺脫生之煩惱，愁苦的時候比愉快的時候多，而生的樂趣也就很淡很微了。游牧藏民過着最簡單的生活，沒有美好的享受，也沒有奢豪的慾望，他們的確做到無憂無慮，澹泊寧遠的超然環境了。

我們很少看見有人愁眉苦臉或是長吁短歎，草地兩個多月就未嘗聞哭聲，到處都祇碰到輕鬆愉快和顏悅色的笑臉，楊溢着喜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逐水草而居，靠牛馬爲生，放牧水濱，馳馬原野，或在山頭引吭高歌，沒有太多的需要，也沒有名利的野心，生活恬靜得有如森林中流着的一條小溪那麼平和柔緩。假如世界上真有人能够跳出苦海上登極樂世界的話，那首先超脫的恐怕就是這些人了。

在歐拉牧地上，我們會見一個殺人犯的全家被鎖鎖在高挂帳篷內，晴和天氣圍坐草地上晒太陽，嘻嘻哈哈，毫無一般囚犯的頹喪表情。雖然他將被判賠

出全部的財產，但他可以去替別人做工，同樣有飯吃，也就一樣可以快活地生活下去，因此毫不難過或憂沮，這種完全超脫於物質利祿的人生觀，實在是現在社會的奇蹟。

說起來，這麼樂天的人生觀也非偶然，自有其背景。第一是簡單的生活，需要少，慾望低，一件老羊皮襖蔽體，藏肥羊肉填飽肚子，已經滿足，沒有掠奪發財的野心，也不想踩在別人背上墊高自己的地位。活着，用自己的氣力換取日常的需要，除了維持健康與延續種族外無他求，你固然可以輕視他們沒有思想，生命沒有意義，愚陋得可憐；可是他們却確確實實地是現在世界上最活潑最愉快的人，頂接近自然的天之驕子，我們永遠辦不到的。其次是宗教的影響太大，使人把一切生老病死貧富貴賤都付諸天命，命運既已注定了他底一生，落得快快活活聽其自然的生活下去。幸運是天賜，命中有此福氣無須化子拾金般的得意忘形；疾苦不幸也是注定的磨劫，無可苟免，也能處之泰然。死，更是生前已先註定的，(俗傳先註死後註生)，壽數長短，不可強求，而況死可以脫離苦海，超升天國極樂世界呢？知識粗淺自然也是重要原因，無知初民本就是混沌度日，不知悲傷憂愁的。但我們也不應忘記，知識本來的用意是給人創造快樂與幸福的，可是如今，知識却把我們擲入了痛苦的深淵，帶來毀滅的威脅，面對這班歡嬉愉快的人們，我不禁深悔求知了！

六 蒙古女王

前面已經說過藏民游牧生活的概況，現在還要特別一提的是在這片草地裡還有一部份蒙古人居住着，而且他們底首領還是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呢！我們會在她牧地(蘇戶)上逗留三日，作爲王府的佳賓，現在談談關於這位女王的印象。

清代初年，元太祖的十一世姪孫順賢汗率部族由新疆徙佔青海，派第五子伊勒都齊領前頭旗，稱「多羅郡王」，是爲「青海蒙古和碩特前首旗」的始祖。傳子博碩克圖濟農，康熙時入京朝覲，被封爲「黃河南親王」，賜給印綬，世襲承繼，現已傳至十一世。濟農親王虔信佛教，樂善好施，拉卜楞大寺便是他一手創辦的，寺院領地(超過王府牧地好幾倍)也是他捐贈的；拉卜楞寺之有今日的繁榮，成爲西北藏族文化與信仰的中心，飲水思源，應該完全歸功於這位慷慨熱心的王爺。

雖然濟農親王以畢生精力與四分之三的財產經營建造了宏偉的拉卜楞大寺，歷代親王也都虔誠地皈依佛教，並且把牧地生產得大部份供奉佛爺，然而神靈似乎並沒有特別庇佑和降福王廟。數代祖傳，至十一世親王噶瑪覺幼齡嗣位，因爲在他上面的幾個哥哥都生而不育，所以特地把他拾生寄名在嘉木樣大活佛的法台下，唸經拜佛，結果還是不能延年益壽，壽僅僅二十六歲的年華便拋下老母弱妹與空虛的王位而超升天國！尤其遺憾的是他沒有留下王儲，這局面下

祇得由他底妹妹權攝旗政，待贅增生子後再正式繼承王統，她便是我們會所見的女王了。

她，「青海蒙古和碩特前首族黃河南親王」，藏名「札喜才讓」（譯音）。雖然是蒙古族。但居住藏區二百餘年，歷代王妃又多選自藏族，一切生活習慣和語言文字都早已藏化了。她不識蒙文，也不懂蒙話，着藏式寬大長袍，梳藏女一樣的髮式，身材高大，長圓臉蛋，風信年華，明眸皓齒，富健康美，也很嫵媚，態度溫文嫺雅，舉止大方，有大家閨秀之風度，却不像一個驍勇善戰的民族領袖。

她名為親王，實際用不着管理旗政，因為那些事務全有明達幹練熟諳旗政的母親蘭曼藻（譯音）去處理。事實上，自然也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即使真有什麼「大事」，年輕的姑娘也是不會應付的，當客人拜訪的時候，她總是安靜地坐在王妃一旁的矮凳上捻佛珠，畢竟是一個閨女，還不免靦靦羞羞，很少講話，沉默保持着端莊高貴的儀態，但也威嚴可怕。

在拉卜楞寺院的東邊，原本有座寬敞而不算富麗的古老的王府，新近又在寺院後面的山坡上建築一所玲瓏精緻的別墅，然而多半的時間也是住在草地帳篷裡。她底領土距離夏河縣治西南兩三馬站，除直轄的蘇戶牧地外，還有「外思」，「大鏡」，和「土爾扈特」三貝子（貝子即小王的意思），也歸她管轄，共約三千餘帳篷。春天，當山頭雪融，河水開始活動的時候，她離開夏河到牧地上去，帶着王府的牛羊馬羣和她底牧民們一起過遊牧的生活；冬天地變成雪海，她把牧地上的事務交給管家，又回到拉寺，安靜地度過北國漫長的隆冬。

在草地裡，女王和她底母親同住一頂蒙古包，位置在寬谷中的小岡上，旁邊是秘書和管家的蒙古包，前面一個大的牛毛帳房是廚房和下房，作為王府當差的牧民們圍居在低平的寬谷中，這便是草地的王宮，日子悠閒輕鬆，生活平靜得如秋陽下的塘水那樣幽靜平緩，誦佛經與學漢文是她每天的日課。像許多貴婦人那樣，她養了幾隻小狗，當女王圍爐閒坐時，它們便坐臥她底腳下或爬在她底膝上，她愛靜坐撫摸着牠們，並聽別人談天，有時候她自己已高興到廚房裡去做幾樣拿手的菜，晴朗日子，也偶爾策馬原野裡馳騁一回，看看她底牧民與他們的牛羊，或是看侍衛們圍獵，槍聲起處，驚得大羣的黃羊在山坡上狂奔，亦是很有趣的事兒。

四壁懸掛着各式樂器，這說明了王室音樂空氣相當濃厚；母妃蘭曼是草地馳名的音樂家，死去的更噶環覺親王頗善工尺，現在的女王也雅好彈唱。在那與世隔絕的草地蒙古包裡，貴為親王，既不能隨便遊蕩，假如再沒有一點娛樂

來調劑解悶的話，歲月將更加枯燥和不易打發了，所以她們對於音樂的愛好，也是極自然的。應遠客之請，王母曾彈了一曲琵琶，女王也唱了幾隻藏歌，大概是跳神用的禮讚之詞，簡單肅穆，聲調悠揚婉轉，珠圓玉潤，像山脚下石隙中流出的一泓溪水，似敲金瀉玉地那麼幽遠、柔美、輕盈、歡愉。她們並且與家人合奏了一曲，胡琴、琵琶、洋琴和簫、笛等，儘管語言文字不同，生活習慣相差得更遠，但是蒙古人指上彈奏出來的藏歌却是同樣的生動感人，音樂的偉大魔力真可以奪天地造化之功呢？

七 藏區旅行生活拾零

草地兩月的旅行生活中，很有些新鮮而饒富興趣的瑣事，略記一二。

黃河自貴德以上，河水碧綠澄清，漫步河畔，可以清晰地看見一羣羣的魚兒，那樣地悠游自在，那樣地膽大無忌，從容得簡直有些令匆忙的旅客嫉妒。看他們那樣大膽。我有意擾亂牠們底平靜；燭火上做了幾個釣鈎，繫在細行李的繩子上，裝上麵團，再在繩端吊一塊石頭，拋沉水中，拉着另一端靜坐水邊，從未經人捕捉過的魚兒（藏民風俗是不許捕魚的）不知利害，爭來搶食，繩子震動，舉鈎得魚，不多功夫就足夠一頓豐富的佳餚。這是一種肥碩碩長，黃色無鱗的魚。後來有人說是吃死人的肉（水葬）才長得如此肥壯的，這一來嚇得我們再也不敢貪食此口福了。

打獵也是草地旅行中的一種娛樂，馳馬草原，常常可以看見大羣黃羊在山崗上戲嬉，它有苗條的身軀，纖長的四肢，細緊的肌肉，像一隻小鹿而沒有礙事的長角，輕快驕健，適宜於奔騰疾馳；因為常易遭人暗算的緣故，牠們具有高度的警覺與銳敏的目力，獵者須在很遠的地方臥倒，瞄準黃羊的頭，只一槍，中了固可飽餐數頓，打不中那便驚散飛奔，再也追趕不上。我們曾有過不少的機會嚐試，誰也沒有擊中，而各部護送的番兵却是很少虛發，草地的子彈比食糧還要可貴，決不肯隨便浪費，除非能有相當把握可以換得代價。草地裡野雞兔子也很多，野雞常可打到，有一隻獵犬的話，捕野兔更加容易。

草地沒有林木，鳥類也不多，但有一種類似麻雀的小鳥却很多，築巢草叢中，高飛入雲，飛得越高叫得也越起勁，而且很好聽，許是一種雲雀吧。我曾有兩次拿帽子罩住學飛的小鳥，扯下被角的棉絮為它做巢，拿我們僅有少量寶貴的米餵它，但結果總因為不肯進食而不得不把它釋放。

到蘇戶牧地的那天早晨，天氣晴和，經過一片平坦的大草灘，縱馬馳驅，正當大家都很高興地歡騰呼笑的時候，突然馬失前蹄，將我從馬背摔到了馬頭

上，幾乎跌下馬來（在草地裡這是丟人的事），着實掃興。檢查之後，發見地上有許多小窟窿，都是小田鼠挖的洞，這種鼠有團圓圓的身體，很像小兔，但耳朵却與普通的耗子一模一樣。黃河南親王府的參謀長告訴我們一個捕捉這種田鼠的妙法，經我們屢試皆驗，說來稀奇之至，原來這種耗子，每穴有兩出口，拿吾人大大袖罩住一洞，偏身向另一洞中吹氣，它便從洞中逃出，恰好鼠入袖中就擒，但，你得小心，當它猛然攢入衣袖筒中的時候，切莫驚惶失措得立刻縮手抖袖，否則它便趁機逃脫了。

晴朗的日子，起床梳洗後在帳篷前茸茸草地上鋪一條地毯，盤膝而坐，或歪身躺着喝牛奶，隨手從牛尾口袋裡掏出一把乾碎的「鍋塊」（這是草地裡的餅干），揀去牛毛，塗上酥油，一塊塊慢慢吞地吃已經不早了的早點。牛羊早被驅到山中或河灣裡吃草去了，我們底勤務也都分別去河邊洗衣、釣魚、或上山，拾磨菇找黃羊去了，雲雀在天際歌唱；陽光照着茵茵的草海，像遠處的電爐似的放送溫暖的電子。旅伴們自由散坐倒臥，烟和奶茶都充分準備在旁，丟開一切正經問題，大家敘說各人故鄉四時的景色，或是交換各自旅行的經歷見聞，慢慢地沉入了半睡的夢境；在烽火漫天，血肉橫飛的世界裡，如此雍容怡暢的神情，雖非西天極樂世界，至少庶幾近乎仙境不遠了。

帳篷生活究竟是一種什麼味道，我實在說不上。休息的日子躺在帳篷裡抽烟，看烟霧濃重，擴散，終至消滅，太陽透過布幕照在身上，溫沁柔和，生活算得恬靜從容吧？但你必然會想起住慣了的都會小洋房，馬上記起這原只是個異地殊俗的旅行，於是心情也隨即緊張起來了。在這荒遠的邊疆，與世隔絕，長遠不見報紙也接不到朋友的來信，總難免感到些空虛與寂寞吧？說寂寞可是真，空虛却不見得，這種場合最容易激動靈海的波瀾，不是空虛而是洶湧的潮汐，愛情、憎恨、理想、希望、真理、藝術、人生……一切的問題都呈現腦海，構成一幅深刻的圖畫，徘徊神往於這些圖畫之中，思想複雜忙碌，感到跟着波動起伏。頂聰明的辦法是切勿回憶往事；「繁華事散逐香塵」，面對當前的環境，領略過「宴席人散後」的滋味，頂容易「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了。也許就在這時你會不知不覺地種下了皈依佛門的厭世種子。

八 草地漫談

這裡再記述一些前面各節所遺漏了的一些零星小事，作為本文的結束。我們已經說過藏民的服裝祇有一件老羊皮襖，一雙長筒靴和一頂氈帽，裡面很少襯衣。尤其是婦女，按照習慣是不允許穿褲子的。據說穿了褲子便不能生活佛，沒有活佛生命便失去了主宰，而生活也就不能繼續了。很可喜的是由

於與外界往來的漸趨頻繁，風氣漸開，這種禁例似乎慢慢地有被廢除的趨勢了。藏民區乃是頂講禮貌的，拜客，致敬或送禮物時，必定先呈「哈達」。「哈達」是染色（多數淡藍色）的紗布條，長約二尺許，最恭敬是雙手舉至額前，鞠躬呈獻對方之前，普通兩手平托遞送受禮者，相當於投帖拜謁的意思而更恭謹些。寺院管事或頭人來求見時，必先呈哈達，松潘茶與酥油。有時我們也以別處收來的哈達回贈，這對他們要算殊榮了。

草地盛行天葬，決無墳墓，人死後，家屬將屍體搬到擴野的山溝裡，由喇嘛經超度一番，祝福死者脫離苦海超升天國，並且嗚嗚地吹喇叭，奏一陣樂，然後用刀子將屍體割開，分裂無數小塊，甚至連骨頭也敲碎。有一種名叫古叉的肉食的鳥，是鷹的一種，兇猛可怕，專吃死人或牲畜的肉，是天葬的執行者，一聽到喇叭嗚嗚的吹起送葬的調子就知道有一頓飽餐，四面八方雲集而來，等送葬的人去後，它們便叫囂着爭選豐富的食物。大家相信，吃得越快死者的靈魂也越早得到解脫，吃光了他（或她）就可以超升天國。這雖是無稽的迷信，事實上却也可以節省不少無謂的浪費，至少沒有墳墓佔據牧地。

「馬拉船」，這名詞對你大概是聞所未聞吧？在頭道黃河渡口，從外思到歐拉牧地，我們就坐的馬拉船過黃河。所謂船，只是一隻長方形的大木匣，把馬尾敷在船頭繩上，一人手牽繩，策馬泅水拖船過河，水勢相當湍急，故拉船的馬必須健壯有力，而且要堅強鎮定，否則游至中流忽然驚慌或力竭那將是不堪設想的慘象；這船平常沒有專人管理，「官差」過此，必須預先通知準備。普通旅客都是自己攜帶一只羊皮袋，衣履佩劍均裝入袋中，吹氣鼓脹，紮緊袋口，縛於腹部，入水後伏身打氣的袋上，一手划水，一手牽馬浮水渡河，又是一種渡河的妙法。

在蘇丹牧地上，適逢「娘奶節」，這節日究竟傳說若何，因我不懂藏經，亦無法查考，不過據猜想，大概相當於母親節的意思。日子是舊曆四月十五日，從十四至十六三天內，女子均吃齋誦經，亦如避煞，這或者是紀念雙親養育維艱的孝思。據說這節日在拉卜楞有一番盛況，婦女們都盛裝入寺膜拜，可惜我們在草地裡未見什麼熱鬧。

當我們從夏河轉往卓尼的時候，兩邊正因事發生衝突，陳共械鬪，男人們都應徵巡邏打仗去了，留下的都是婦女和小孩。照理打仗是拚命的事，男人出征，家人必然憂慮愁慘，寢食不安，但我們所見到的景象却與平常完全一樣，一切工作照常進行着，空氣依舊輕鬆愉快，我們不能不佩服藏胞豪放樂天的性格是達到了超凡的工夫。我曾經想，假如在草地裡訓練一批騎兵，以他們勇武堅忍的精神，嫺熟的騎射技術，加以新戰術訓練和新式裝備，可成一支無比的機動隊伍，這倒是值得軍事當局注意的事。

古代文物在蒙古

江上波夫等合著
烏尼吾爾塔節譯

在亞洲地理上佔有最大土地，以及歷史上在舊大陸被稱為最大遊牧根據地的蒙古，其學術上之探究工作，迨至十九世紀，方逐漸為各方所重視。

俄人伊亞金夫、包太寧、普魯基斯基、普茲多也夫，美國的潘伯利諸氏，對蒙古的自然、人類、文物、史學等首先有所研究闡述，貢獻至鉅。

自俄人亞多林斯夫於一八八九年在外蒙古鄂爾渾河畔，發現突厥畢魯該可汗及其弟基魯帖金之碑文以來，有關蒙古古代文化之探究工作，確已進入一劃時代的紀元。該碑文係以突厥文和漢文對照寫成，記載畢魯該可汗等之功業事蹟，為唐朝玄宗時代所建者。

俄國科學學士院又派拉特羅夫、庫來民茲，以及發現碑文的亞多林斯夫等氏，前往鄂爾渾河，色楞格河兩流域和阿爾泰蒙古地區，再作實地探查。另一方面芬蘭考古學會也派哈伊凱路氏等，對鄂爾渾河碑文，和其他有關史蹟同樣的作調查工作。對該碑文均曾煞費苦心作過深入的研究，然以不諳突厥文的讀解之故，未獲要領。

在鄂爾渾河畔亦復發現回紇的都址卡拉·巴魯嘎森，以及蒙古的和林遺址耶魯台尼茲烏，對該處廢墟殘狀和具有歷史性的碑石類物，曾作詳盡的闡釋，故而轟動一時，於是舉世研究亞洲史蹟學者們的眼光，均集中於蒙古矣。

繼由芬蘭考古學會自一九〇六年起，再派固拉文，滿愛儒哈木等氏，主要探查蒙古西北部之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烏梁海等地方，費時數載。氏等在彼發現若干古代墳墓，石造人像，刻有圖文的岩石，和舊時都址的廢墟。這對蒙古古代文化的研究上，又提供了很多寶貴資料。

俄國地理學會於一九〇八年復派卡茲羅夫等，在其第二度赴蒙探查途中，在葉琴河下游，發現被沙漠埋藏已久的西夏舊都，所謂卡拉浩特之遺址。並獲得佛畫、佛像以及古代文獻甚夥。

一九〇六年日本鳥居龍藏博士，曾以內蒙古昭烏達盟的巴林、翁牛特等地為中心，再沿大興安嶺山脈跋涉，北自外蒙古車臣汗的貝勒爾湖起，南至赤峰、多倫一帶的遼瀾地區，作過普遍深入的調查。這對於研究蒙古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資料方面，頗多獻替。

一九二二年以來，法國的李薩恩、帖拉魯二氏，為探查古生物學，連年在黃河流域及南部蒙古，進行調查工作。卒於鄂爾多斯地方發現、屬於地質年代上第四紀中期的動物與化石合成的舊石器。由此對於東亞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鑽研工作，別開生面矣。

蒙古逐漸被各方確認為研究東亞學問的重要寶庫，它對瞭解東亞的自然，文化方面，提供了很多珍貴資料。以故各國學者們競相組織龐大的學術研究隊，前往探訪。其中重要的如安多力吾斯氏所主持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中亞探查隊。俄國卡茲羅夫所率領的蒙古，西藏探查隊。並有斯文赫定氏率領的瑞典和中華民國聯合舉辦的，西北科學考查團，活躍該區。

安多力吾斯探查隊之被派往蒙古，是為證實奧斯鮑恩氏等所倡導的一種學說。認為哺乳動物發祥地，即人類遠祖（*Primates*）之出生地為北亞高原。該隊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間，作過空前大規模的五次巡迴調查。參加者有動物學家安多力吾斯本人，古生物學家連嘉·奧如賽，地質學家毛力斯·巴奇，考古學家乃如村等。此外並有測量、攝影，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共達數十人之多。經常使用十數輛汽車和百多頭駱駝行駛着，並以二十五萬以上之鉅額金圓充作經費。其探究結果誠然不虛此行，首次發現恐龍（*Dinosaur*）之卵，以及多種爬蟲類和哺乳動物的化石，收獲至碩。致使當時全球的自然史學界，感到震驚。

俄國的卡茲羅夫探查隊，於一九二三年由庫倫出發，次年在北蒙古諾顏山上，發現古代匈奴王室墳地。經挖掘其中十處墓穴，得知當時木造棺槨的構造情形，並獲得漢代產品綢緞、刺繡、漆器、玉器，和匈奴自製的絨氈、黃金、銀製飾板，以及當時居住土耳其斯坦的伊蘭人所制的刺繡品等。這顯示了西曆紀元前後，亞洲物質文化是如何的絢爛發光，和其民族間文化交流的親密活躍情形。由此再度引起全世界研究東亞問題的學者們，進一步對蒙古的重視。

繼而該隊擴大編制由巴勞伏加氏擔任考古學班，伍拉帝米如茲夫擔任土俗語言學班，巴魯諾夫擔任自然地理學班，庫布萊特斯基擔任地化學班，賴伯特瓦氏擔任地質學班，並由各氏分別指揮各班，展開對外蒙古全境的探查工作，直至一九二六年結束。惟本次探查結果尚未全部發表，令人不勝期待之至。

於是國際間競相展開對近代蒙古學術上的研究工作，調查範圍亦日益擴大深入，而終於走向研究專門科學的趨勢。向與西藏同被稱為亞洲「神秘之邦」的蒙古，由此逐漸為世人所重視。惟其境域遼闊，廣漠無垠，故一時尚難明瞭其全部真相。

西藏名稱與境域之沿革

宋龍泉

西藏一詞，清代以前史籍，概未之見，至康熙時始見於平定西藏碑（註二），與果親王之西藏記。然當時亦不過偶然稱之，如平定西藏碑，凡三稱圖伯特，僅二稱西藏；西藏記則曰：「西藏一隅」；明日烏斯藏，今日圖伯特或唐古忒，可見西藏一詞，尚不通用，惟既經帝王擬定，遂得通行官書。雍正時，派駐圖伯特之大員正名曰「駐藏大臣」，西藏之名，由是固定，其後大清一統志有西藏篇，魏源（默深）撰聖武記有撫綏西藏記。西藏之稱，遂不絕於史籍矣。蓋藏人稱雅魯藏布江（Brahmaputra）為「藏楚」，清潔之水也。英文譯音為（Tsang Chhu）。雅魯藏布江流域之地，為西藏政治、文化、商業、宗教之中心地，重要城市如拉薩，日喀則，江孜皆散處此區，清人不過偶加「西」字於藏，以言其部位在國境之西也。

大清一統志載西藏之境域曰：

「衛：在四川打箭爐西北三千餘里，即烏斯藏也。蓋當地字『烏』加『斯』字，切音作衛，居諸藏之中，亦名中藏。東自木魯烏蘇岸西海部落界，西至噶木巴拉嶺藏界，一千五百三十三里；南至鄂木拉剛冲嶺，北至牙爾佳藏布河，二千二百餘里。

藏：在衛西南五百餘里，東自噶木巴拉嶺衛界，西至麻爾岳木嶺阿里界，一千八百八十二里。南自帕里宗城之畢木拉嶺，北至者巴部落之北打魯克雨木撮池，一千三百餘里。

喀木：在衛東南八百三十二里，近雲南麗江府之地，東自雅龍江西岸，西至魯卜公拉嶺衛界，一千四百里。南自噶克拉崗里山，北至木魯烏蘇南岸，一千七百里。東南自雲南塔城關，西北至索克宗城西海部落界，一千八百五十里，東北自西海部落界阿克多穆拉山，西南至色勒麻崗里山，一千五百里。

阿里：東自藏界麻爾岳木嶺，西至巴第和木布嶺，二千一百餘里，南自匝木薩喇嶺，北至烏拉嶺，一千三百餘里，此西藏之西邊鄙也。」（註二）

清初西藏之境域與清末略有不同，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清廷平定準噶爾之亂，命青海脫離西藏範圍，而成一新的行政區域，光緒三十二年趙爾豐出關極力經營康地，施行改土歸流政策；宣統三年，傳嵩秋擬建西康為行省；以丹達山與藏為界後，民國二十八年西康始脫離西藏之範圍，正式成立行省。西藏之境域只限於今日之前後藏矣。

西藏在歷史上，每易一名稱，其境域之大小與政治形態，均有變更。而政治上之境域，實小於種族上之境域也。茲列述西藏名稱與境域之沿革如後：

古昆侖國

戴氏水地記曰：「河源以南唐吐蕃今西藏之境，古昆侖國在焉。

。積石以東北今青海之境，古析支在焉。而漢通大宛西域，踰葱嶺而西，古渠搜在焉。三地大小諸國通稱西戎，繫於雍州。」（註三）

三危之地

清康熙五十九年之上諭云：「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為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所屬為危地（按即衛中藏也），拉里城東南為喀木地（按即康前藏也），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註四）藏之名三危，殆由禹貢導黑水而得其詳也。所云哈拉烏蘇者，即蒙古語之黑水。蒙語「哈拉」為「黑」，「烏蘇」為「水」。此水即雲南潞江（一作怒江）之上游，源出拉薩北二百八十里之布喀池，往西北流百餘里入厄爾凡根池，復往東北流入衣達池，從池轉東南流入喀喇池（與圖作喀喇池）始名喀喇烏蘇（哈拉烏蘇，亦名喀喇烏蘇，譯音之異也）。循是經喀木（西康）入雲南，名潞江。會南丁、南板等河入緬甸，稱薩爾溫江，注入印度洋。李元陽黑水考曰：「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又古以渠搜析支昆侖為雍州地，禹貢三危亦為雍州，則三危正界三國之間，今之烏斯藏亦古雍州矣。」（註五）由黑水之所自，可知三危之所指也。按清代俞浩西域考古錄卷十六上西藏頁一載云：「三危者，猶中國三省，今唐古特（即今西藏）部落，其地分康衛藏三部，合三地為三危也，黑水由其地入海，故曰入於南海也。戴氏亦以今之三危山，其名起於後代，不可為據云。」三危既為唐古特，俞浩復云：「唐古特亦曰土伯特，其地分三部，曰康，即巴塘西察木多之地，亦曰喀木曰昌都是為前藏（北史白蘭西南二千餘里有女王國，唐書東女國有八十城居康延川即今之康地）；又有多彌國，即北史之當迷，其國瀕犂牛河，亦即今喀木東北地），為西藏門戶，水土較他處濃厚。曰衛，即危也，今日布達拉，唐古特人謂山為拉，華言普陀山也。今為達賴喇嘛及駐藏大臣所居，亦曰拉薩，華言山地也。相傳即吐蕃贊普建牙之所。唐書之邏娑川，西則跋布川也。魏氏稱其地膏沃，人秀好，音華夏，故吐蕃贊普以之鞭撻四夷，抗衡上國，而宗喀巴卓錫以來，能使數千里外之蒙古厄魯特，喀爾喀及諸番族，奔走其號令，若驅攝於靈奇磅礴之中而不自知，豈非地利之一異乎，是為中藏。曰藏，即扎什倫布，華言吉祥山也，本拉藏王所居，今為班禪厄爾德尼之地，班禪者，金剛之稱也，是為後藏。又並極西之阿里城則稱四部云藏地。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五千餘里，北界河源，南界大金沙江，西距岡底斯山，東至打箭爐，距京師萬有四千餘里。」以上所謂之康衛藏之境域即禹貢三危之地也。

西戎

周秦有西戎之名，蓋泛指西方諸國之總稱也。書言：「西戎即叙」

，鄭玄曰：「衣皮之民，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據戴氏水地記，古昆侖即唐吐蕃，今西藏之境。

西羌 舜典曰：「舜竄三苗於三危」。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七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鄰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胡渭云：「漢人謂積石爲河首，北音讀「析」如「賜」，故云。其地後爲黨項所居。」通典云：「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也。」河首爲今青海大積石山，狹義言之，自今青海大積石山至甘肅寶德縣界，爲西羌之地。

北史云：「黨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犂牛尾及粘羶毛爲屋，服裘褐，披氍毹爲上飾，俗尙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養犂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訕齡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天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開皇元年，有千餘家歸化。……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共討之，大破其衆，人相率降，……自是朝貢不絕。」（見北史卷九十六，列傳第八十四）

五代史云：「黨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唐德宗時，黨項諸部相率內附。」（五代史卷七十五）（四夷附錄第三）

閱此五代史所載，黨項西羌之遺種，與後漢書西羌傳所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與北史所言黨項爲三苗之後者正同，則可知漢代西羌分佈之境域，與黨項略同，而隋唐五代時之黨項亦可視爲今日藏族之祖先也。

在中國歷史上，羌似與漢族之關係特別深遠。質言之，羌族與漢族實可謂爲屬於同源而異流之支屬。漢代之羌大致分佈於青海或西康一帶；後漢書西羌傳所謂：「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者是；及今西藏本部即後漢書西羌傳所謂：「……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列傳七十七）者是。現今居於青康藏一帶之民族，如同唐古特喀木等，語言方面亦本與漢同屬藏語系。（註六）

甲骨及金文俱有羌字。說文解字：「羌，西諸羌、西方牧人也。」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傳云：「羌在西」。詩商頌殷武篇：「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可知羌人與華夏之關係，發生甚早。後漢書西羌傳既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是以羌字與姜字互有淵源而認爲一族。本來姜字與羌字實應同源，姜字从女，羌字从人，彼此造字之命義是一貫的。關於「姜羌爲一字」一說，傅孟真先生在「姜原」一文中，已有所道及（註七）姜姓之祖先，據國語晉語稱：「昔少典氏取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姬姜是兩顯著之族姓，並且互相通婚，因此姜姓在周代成爲王室中之重要諸侯。但其中落後之部族，仍然被稱爲戎。足證華夏與戎狄之分，乃是基於文化上之關係。

吐蕃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吐蕃傳云：「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尙幼，弟釋種嗣位，以樊尼爲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釋種爲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召集餘衆，以投葉蒙遜，蒙遜以爲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

樊尼威惠夙著，爲群衆所懷，皆無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爲勒罕野，以秃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通於中國。」此言秃髮利鹿孤之後樊尼，亡國西奔，臣諸羌而君之，若後世滅人之國，而臣子其民者，吐蕃之族似有異於漢之羌也。實則兩民族結合日久，相與俱化，血統逐漸相融合矣。

吐蕃傳中所云秃髮亡國，率衆西奔，於羌中建國及西羌傳中所云，三苗徙之三危之事也，若是，則藏之人種，爲黨項，秃髮二族之混合，益得明證矣。蓋三苗徙於三危，其裔有名黨項者，別居析支，後魏時，鮮卑之裔南涼秃髮，國滅被迫西奔，是時羌族勢微，遂臣羌衆而君三危，兩族混合建突髮（吐蕃）國。唐時復與居析支之黨項一支合，國益衆矣。

漢代時西羌中之「發羌」，或亦爲唐代時「吐蕃」之祖先，關於發羌，舊唐書吐蕃傳並未提及，獨新唐書卷二百十六上吐蕃傳提及曰：「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嶺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罕野，健武多智，稍並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勒罕野，或曰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關於「吐蕃」與「發羌」二詞之關係，歐陽無畏先生依據上述一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的記載，認爲此句有兩種句讀：（一）「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二）「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第一種句讀，意謂「蕃」字和「發」字的讀音相近，因爲「發」字就是蕃字的「入聲化」的讀音（詳說見後），故漢代稱爲「發」的羌種，在唐代有唐音的名稱而稱之爲「蕃」。不論爲「發」爲「蕃」都是音譯，祇是「聲近」；而與其稱「吐蕃」之名之多出一個「吐」字。這個「吐」字却有「發聲」之義，譬如「吐屬不凡」之吐，「口吐人言」之吐，皆爲「發聲」之義，「蕃」字藏文爲 Bod-pa，義即爲「呼聲之種人」。其古史神話，自認其種人出於獼猴，猴類不能人言，祇會吐出極簡單之呼聲「鉢！鉢！鉢！」

鉢-] (Bodī Bodī Bodī) 故其種人自稱為「鉢人」 Bod-Pa，所以「鉢」 Bod 字，在其文字中，不但其意義作「呼聲」解，而且也是猴語「鉢-」 Bod 的一個形聲字。因此，「鉢」 Bod 字，在音譯上為「蕃」，在意義上譯「發聲」或「吐」，故「吐蕃」二字為音義兩譯之名。唐時對於邊疆民族，如奚、南詔……等，有時亦籠統地稱為「蕃」人，（雖然此「蕃」字不是「鉢」 Bod 字的對音），為使此「蕃」之稱，有別於其他之「蕃」，特加一意譯之「吐」於其上，故曰「吐蕃」。據此，第二種句讀即獲致恰當解釋：無論從音譯意譯，「蕃」與「發聲」相近，故曰吐蕃。這句新唐書中之「吐」字索解，纔不落空。此為吐蕃名稱之由來，亦由此可知漢代之「發羌」即唐代「吐蕃」之祖先也。（參見歐陽無畏著：鉢的疆域和邊界。）

有言西藏於宋號西夏者，然考宋史夏國吐蕃實各別傳，夏本姓拓跋，自赤辭納款於貞觀，遂賜姓為李氏，而世為夏州節度使。宋時，元昊稱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據有今之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甘肅西北部，與今所謂之藏族疆域實有別也。且宋史中既有吐蕃傳，似不應再與西夏混為一談。

唐代吐蕃之疆域較今日為廣，其極盛時代為棄宗弄贊贊普（即松贊幹布）在位時代及其孫繼為贊普，其相祿東贊輔政之時代，祿東贊好大喜功，曾威服諸羌，吞併吐谷渾（今日青海大部）北取龜茲（今新疆庫車），及今日四川之松理、茂以及西康之西昌。其極盛時之疆域，奄有今日西藏、青海、西康全部之地，與新疆、印度、緬甸、雲南、四川、甘肅之一部，成為傳世三百餘年之大帝國。

烏斯藏 元代至忽必烈為帝，即元世祖，定佛教為國教，尊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並命製蒙古新字，字成，於世祖至元六年，頒行天下，同時對於吐蕃之境域，則視同郡縣，設官分職，晉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加帝師封號，使領藏地，並主藏地中樞所設之宣政院，總攝天下佛教及吐蕃政務，此乃政教合一之制度也。元史八思巴傳載曰：「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吐蕃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於西土。」（註八）宣政院之下設宣慰司三，宣撫司二，分轄路府州縣。其名稱為：「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脫思麻路宣慰司都元帥府，松番客屬威茂等處宣撫司，碣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等處軍民宣撫司，烏斯藏（或烏斯藏）納里迷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其中烏斯藏管蒙古軍都元帥府轄地略同於今日前藏詳見下）。（註九）「烏斯藏」名稱始見矣。明襲元舊，改元之「烏斯藏管蒙古軍都元帥府」為「烏斯藏都指揮使司」。「烏思」（或斯）本藏語 d Bus 的音譯，義為「中央」係指今日以拉薩地區為中心所謂前藏地區，所謂「藏」係藏文 gTsang 之音譯，本義為「清潔」

或「清淨」。藏地惟一大河名 gTsang Po，即藏布江。唐書稱「藏河」即此。唐書上更無所謂「藏」或「藏」之地方。藏字係後來稱謂，乃指以日喀則為中心之地區，地方甚小，並不包括「烏斯」和「阿里」地區在內。明代又稱「烏斯藏」為「西番」，乃係將「吐蕃」之「蕃」字單頭略去而言（註十）。

明史關於「烏斯藏」之記載見於西域傳中之烏斯藏大寶法王傳，載云：「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四川馬湖府千五百餘里，陝西西寧衛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群居大土台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楞伽經至萬卷，其土台外僧，有食肉娶妻者。」（註十一）

按馬湖府，即金沙江下流也。明會置馬湖府於其處，清廢，今為屏山縣。傳中所言群居大土台上，蓋指拉薩之布達拉宮，為達賴清修之地。班禪未分掌後藏時，亦居此。不食肉娶妻，當指黃教言也，明時宗喀巴大師崛起西寧，誓年入藏，俟後學成，覺舊教（紅教）之背律旨，妖邪惑衆，乃別創新教，而黃其衣帽，以為識別，故名黃教，寂滅後，命其二大弟子，世世轉生，掌其遺教。明代正黃教極盛之時，明史所言當指此。然大寶法王為紅教遺裔，今為之傳理不應述其相敵之黃教也。縱或述之，烏可全無簡別，此殆後之傳者，未辨其異，故總目之為僧，遂概言如此。又此傳為總述諸法王，未及達賴第三世錯南嘉錯之事跡，其為概略之詞可知也。至言無刑罰兵革，自屬傳聞失誤也。言佛書甚多，而舉楞伽經至萬卷，直不知楞伽為何物也。

大清一統志云：「衛即烏斯藏也，番字『烏』加『斯』字，切音為『衛』」。布達拉宮適在衛之拉薩，亦足證也。

唐古特 唐古特為青海南方羌族部落名，亦作唐兀惕，見元秘史；明末世，以之稱呼青海住牧之羌族全體。厄魯特蒙古侵入青海，唐古特盡受約束。厄魯特無國號，故漢人每以唐古特呼之。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年）年羹堯奏陳青海善後十三條，謂「青海、巴爾喀木、藏、衛為唐古特四大部落」是也。當時尚多稱羌番兩族為土伯特，故此名不甚通用。乾嘉之時，土伯特漸廢，此稱始大通行。大清一統志尚並存圖伯特（即土伯特）與唐古特二名，嘉慶初，駐藏大臣和琳撰西藏圖，遂曰：「土伯特其舊名，唐古特其今號」。（參見黃沛黼著西藏圖考藝文篇。）嘉慶以後，概稱藏文為唐古特文，藏兵為唐古特兵矣。魏源撰聖武記國朝撫綏西藏記上載唐古特四部曰：「初唐古特有四部，東曰喀木，曰青海，西曰衛曰藏。固始汗者（即顧實汗）本厄魯特部，於明季吞併東二部，以青海地廣，令子孫游牧，而喀木輸其賦，其衛地則第巴奉達賴居之，藏地則藏巴汗居之，第巴曰桑結者，與藏巴汗不相能，謂拉藏（？）虐部衆，毀黃教，乞師於固始汗，剪滅之，以其地居班禪，與達賴分主二藏，盡逐紅帽喇嘛諸法王，事在崇德十年」云。

土伯特 稱西藏為土伯特或圖伯特，或始稱於元代。降至清初，仍沿用之

。清室未入關前，先已撫綏蒙古，時蒙古篤信喇嘛教，奉拉薩之達賴喇嘛為活佛，屢請清帝迎致之，謂能降福，太宗崇德四年（西元一六三一年），遣使聘於拉薩，從蒙古語，稱其國曰土伯特，太宗遣察漢喇嘛等致書土伯特曰：「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致書土伯特，自古國君所制之經典，朕不欲其泯絕而弗傳，故特遣使延致聖僧，爾乃土伯特之主，能以佛教施天下之賢人也，倘為前來，則朕心甚悅。至所延請之詞，俱由所遣之額爾德尼察漢等使臣，著之口傳。」（註十二）。由是使節往還，聘報不絕，清既入關，曾延達賴至京說法，當時官書稱土伯特主來朝是也。據歐陽無畏先生分析「土伯特」或「圖伯特」即為吐蕃二字之蒙古對音。元朝封帕思巴（八思巴）帝師為「圖伯特國王」。而於行政區劃上則沒有「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可見「圖伯特」和「吐蕃」為同一名稱之異譯，元代兩存並用。滿清在未入關前，已和西藏有往來，但是經過蒙古人為之中介，所以對西藏也自然沿用元朝之稱謂，入關以後，一切沿襲明舊稱，所以對西藏又採用「烏斯藏」。此外歐美學者稱 Bod 為 Tibet，此字係由元朝時馬哥波羅將蒙文「圖伯特」轉譯過去，或亦由天方史家音譯為阿拉伯文轉譯過去，因為「圖伯特」即為「吐蕃」之蒙古語音譯，當然 Tibet 即是「吐蕃」矣。（參見「鉢的疆域和邊界」一文）此外英國學者查理貝爾之主張略有不同，曾云：「在古時阿剌伯書籍中，有稱西藏為 Tobbat, Tubbat, Tibat 及其他轉音，西方學者大半認定英語之 Tibet，係由藏語 To Po 二字變化而來，To Po 意為「上西藏」（Upper Tibet）」（見 Charler Bell: The people of Tibet）。

任乃強君認為：藏族以吐蕃時為最強，我國世稱之為番人或番人，以此故也，顧藏人乃不自知其為吐蕃，但稱其國曰「白」，非但今世自稱如此，即記載吐蕃時代之史籍亦如此稱，西人稱西藏為底伯特（Tibet），蓋由阿剌伯語之吐伯特（Tubbot）演變而來，阿剌伯古之大食國也。吐蕃盛時，已與大食通商通使，則其所稱國名，當較後世轉譯者正確。質言之，即西藏古國名，原為吐伯特，唐人譯之為吐蕃，省一尾音矣。近世藏人自稱為「白」，則省一首音而尾音亦微變矣，惟中間「白」字音，始終未變。唐時著原讀如「白」，與播、都同為諧聲字，非如今世之讀如落，讀如翻也，即宋、元、明時所稱之番人番僧等番字，亦當讀如「白」音。清以來從蒙古語，呼西藏為土伯特或唐古特，又後遂呼為藏人，番字始廢，番字既廢，遂無能通此義者。（註十三）

近人歐陽無畏先生對於任乃強君所謂之「白」有比較更透闢之解釋。他認為：「鉢」（按即任君所謂之「白」）是「藏語」（應該是鉢語）Bod 字的音譯，依「名從主人」的原則，他們自稱其種人為「鉢」（按即任君所謂之「白」）Bod-pa，地方為「鉢隅」Bod-yul，其文字為「鉢譯」Bod-yig，其語言為「鉢受」Bod-skad，故其名稱之本音，無往而不是「鉢」。唐朝稱他們「吐蕃」，這「蕃」字也是 Bod 字的音譯，應讀為「鉢」，邊疆民族語言中，其唇音部份，很多祇會發重唇音 b 和 p 聲，而不會發輕唇音

f 聲的，（直至今日仍然！）鉢語也是如此，有 p 和 b 聲，而無 f 聲。「蕃」字之應讀作「鉢」，可以從此字和 Bod 字對音音值上，分晰其音素求得。今日「蕃」字讀作 Fan，是「奉」聲，收十四「寒韻」，但唐音雖有「非」「敷」「奉」三聲，與「幫」「滂」「並」並不嚴格分開，當其翻譯別種語言的音譯時，尤其是音譯原無輕唇音的別種語時，發「非」「敷」「奉」聲的字，常用以譯原為發「幫」「滂」「並」聲的字。所以「蕃」字雖發「奉」或 f 聲，其實是對譯「並」或 b 聲的。這個發「並」聲的「蕃」字，現在雖收十四「寒韻」，舊時實收入十三「元」韻，故其收韻不是 an（寒），而是 oan（元）。因此，唐音讀「蕃」字為 Boan。這音尾收齒頭鼻音 Dental Nasals 的 n，使其「入聲化」Denasalization，也就是取消其鼻音的音尾，就成為收 d 音尾的 Boad，這正是「蕃」字所譯原語的原音 Bod 字了。因為 Bod 字是從 Bad 字上加 O 母音符變成的，寫時雖略去 a 字母而，祇留 o 字母，但讀時 Bod 仍需讀做 Boad。我用「鉢」字來音譯 Boad 或 Bod 字，就因為「鉢」字發 b 聲，不同「蕃」字之今發 f 聲；又「鉢」字今仍保留入聲音尾的 p 聲，收七「曷」韻。國語中雖讀不出入聲，但今閩粵方言却仍清清楚楚地讀得出入聲尾的 p 音。

「吐蕃」的蕃字應讀作「鉢」，還有一個證據：拉薩布達拉山麓，豎立有一塊九世紀初時的「唐蕃舅甥會盟碑」，碑文是漢藏兩文對照，（其實是漢「鉢」兩文對照！）凡是漢文作「蕃」字的地方，藏文是 Bod 字，不是 Fan 字，所以「蕃」應該作「鉢」。（註十四）

在歷史上土伯特或圖伯特之名稱雖然源自吐蕃，但今日 Tibet 之境域究屬與唐之吐蕃疆域不同。可是英人自佔領印度後，却不斷進窺西藏特意將 Tibet 一字之範圍擴大，而用以指稱代表唐代吐蕃極盛時之版圖，而將我國青海、西康兩地亦稱為 Tibet 矣，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今幸大英帝國沒落，印度已獨立，往者已為陳跡矣，將來西藏國際關係之演變，亦不容忽視也。

康定西定西藏碑見衛藏通志。

註一 見大清一統志。

註二 見俞浩撰西域考古錄卷十六上引。

註三 見康熙五十九年上諭載西藏圖考藝文篇。

註四 見俞浩撰西域考古錄卷十六下註引。

註五 見勞幹師著：「漢魏時代的西南夷和羌」載於西藏研究。

註六 同上。

註七 見元史第二百零二卷。

註八 見凌純聲：清代治藏制度。

註九 見李昉著：邊疆歷史頁一三六。

註十 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傳第二百一十九。

註十一 見山縣初男著：西藏通覽。

註十二 見任乃強著西藏政教史鑑載康定出版之康導月報三卷四期。

註十三 見歐陽無畏著：鉢的疆域和邊界。關於「唐蕃舅甥會盟碑」原文引自 Li Fang Kuei: The inscription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In Tsung Pao, Vol. XLIV, Livr. 1-3, 1956)

正視共匪圖滅藏族的罪行

黃敬文

自從中共於一九五一年侵入西藏之後，毛匪澤東就處心積慮地非消滅西藏民族的傳統精神不可！尤其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薩發生抗暴運動以來，中共對西藏同胞的血腥鎮壓更無所不用其極！誠如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致聯合國秘書長字丹的函件所說：「現時陷於中共魔掌中的西藏人民，大有被滅族絕種的威脅！如讓中共繼續地血腥統治西藏而不加以制止的話，則不僅鼓勵中共崇尚殘暴滅絕西藏民族的方法；抑且會增加中共對東南亞侵略的野心與行動！」

事實上由於一九六四年開始，西藏的情勢便進入日益惡化的生死階段，隨着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已被破壞和藏人的身體備受虐待外，西藏的全部糧食供應，也在中共幹部徹底控制下而發生嚴重危機！因此，達賴喇嘛曾數度呼籲字丹及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正視現實，在聯大會議中予以真誠地同情和支持西藏問題。

關於西藏問題的議案，曾經菲律賓、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三國代表共同向大會提出：同時聯大也將此案列入議程，可是始終沒有加以討論，更談不上採取任何行動了。澳洲墨爾本的「前鋒報」較早時指出：「中共在西藏高原上已有系統地，及成功地大肆進行一種消滅一個種族而不惜違背人道的罪行，實為希特勒時代所望塵莫及的！由於希特勒時代僅暗殺了猶太人共約六百萬，却不像中共那樣公開地滅絕西藏民族的行動。」由於西藏地處邊陲，與世隔絕，因而中共可以肆無忌憚地大事屠殺摧毀；藏人最後的精神堡壘——宗教，對西藏僧侶所採的措施，當與俄共二十至三十年代對其國內的回教徒所採措施相同，而逐漸消滅為止。

西藏原為我國五大族——漢、滿、蒙、回、藏——之一，位於中國西陲，與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國接壤，四週全是高山峻嶺，僅有寥寥可數的幾條對外通道；而這些道路都在海拔一萬二千至一萬五千公尺的山隘。西藏的總面積約四十萬方公里，地勢特高，全境平均高度為海拔一萬六千公尺。西藏人的日常生活，以糌粑為主，佐以濃茶，茶中加鹽及牛奶；男人去做喇嘛，不勞而食；反令女人下田工作。

西藏的許多風俗大致與內地相同，由於貞觀十五年，唐太宗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送文成公主往吐蕃與西藏首長棄宗弄贊成婚的時候，文成公主便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是要鑄一座釋迦牟尼佛像入藏供奉；（二）藏王婚後須倡導中國文化，廣傳佛教；（三）因西藏初無文字，不能普及文教，此後必

須設法使藏民皆得潤澤。這些條件均為藏王所接納，並從此開始盛行佛教；且全藏各地都分別建有寺院。可惜數以千計的大小寺院，多被中共所摧毀；其中的金屬佛像則被運走無遺！據達賴喇嘛一九六四年九月，對東南亞各國前往印度參加佛教會議的代表們說：「中共已把西藏的佛經焚燬，金屬佛像亦被熔化後出售；現在西藏僅保留幾個寺院，以供訪客參觀而已。」

達賴喇嘛以上的報導，曾經「觀察週刊」加以證實稱：「中共為了加緊控制西藏，為進一步地將拉薩布達拉宮的聖物或寶藏，運往大陸其他地方去；截至一九六四年冬為止，中共已偷偷運走一萬二千件聖物及珍貴的手抄本，企圖慢慢消滅藏族文化的痕跡。」該週刊更指出：「中共正出售由過去七百年來，西藏歷代喇嘛積傳下來的黃金及其他寶藏，價值約達六十三億四千四百萬美元，以換取其極為缺乏的外匯。」原因是由於中共對大陸內地的竭澤而漁，顯然搜括已告淨盡，因此，西藏便成為中共掠劫的另一個對象。

至於中共對西藏人民控制的手段又是怎樣的呢？據西德「國際新聞社」的消息說：在中共統治下的西藏，差不多每一個月都有數百宗慘劇發生！儘管共幹的嚴密控制，但許多西藏人仍能繼續逃出。截至一九六六年八月為止，先後逃出來的西藏難民共達十二萬七千餘人。可是這些西藏難民，多數散處四方，距離千哩，如無適當的救濟和嚴密的組織，則他們最後註定會被五億印度人所吸收或同化。而西藏境內經過中共多次整肅及徙置後殘餘下來的人口，亦將會迅速地遭遇消滅。印度「達巴查報」根據最近逃抵尼泊爾的藏人所帶出的新消息，聯同達賴喇嘛臨時總部所蒐集的資料顯示，走以拼成一幅血淋淋的西藏民族、文化正趨沒落的恐怖圖畫！

由於一九五九年以後，中共已決定改變西藏的整個面目。它首先把西藏分成了三個區，每區設有一名最高的偽行政官；其餘所有重要的行政人員甚至祇管十名藏人的小組長，都要受過中共特別訓練的漢人。這些小組長對於他們所監視的每一個西藏人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他們隨時可以驅使藏人去做強迫性的奴工，藏人家裏即有一隻雞死了，也必須向小組長報告，而那隻死雞更要交由共幹處理。所有藏人的牲口，早已被共黨沒收；農民每造必須把收穫的百分之七十五繳納中共當局；每四口人家祇准留下三百三十磅穀物，作為下季收穫以前的糧食，由牲口所擠出的乳和酪。亦必繳交中共，作為共軍的給養。但可憐的西藏人十年來已不知乳酪的味道了！假如藏人瞞着少許糧食未繳共幹，他們立即會受到酷刑的！

中共管制西藏人民最嚴密和最毒辣的辦法是：每一個西藏人——無論男女

老少都必須攜帶一張「行為證」，證的上面由共黨小組長把這個人過去和現在的行爲紀錄詳細登記。如果這人從未說過半句反對中共的話，就准他參加待遇稍佳的築路工作；否則那人遲早會宣告失踪的。中共爲了限制藏人穿西藏的傳統服裝，於是對他們盡量減少衣料的配給，不獨使他們再也無法縫製西藏民族的服裝；並迫令藏人把原有的舊式民族服裝一律改爲漢人裝束。如在大街上發現穿有舊時西藏服式的人，馬上遭到逮捕並以反動論處。從表面上看來，西藏人信奉的佛教早已消滅殆盡；所有寺院及其家中供奉的神龕，也全部被封；而古代或具有藝術價值的佛像、銅像、金像及圖畫等等，則被運走。

爲着達到徹底消滅西藏民族傳統的目的，中共於一九六二年起將大批的藏人遞解到關內去。其中主要的是以六歲至十五歲的無產階級兒童爲大多數，而所有地主或富農的子弟，則讓他們活活餓死！然而，西藏人民也不示弱，他

從斯文赫定和趙尺子的話想起

宋念慈

在上三期裏，趙尺子先生曾爲本刊撰寫了「蒙古心臟地」、「蒙古心臟地的右疆」和「蒙古心臟地的上疆」等三篇大作，本期又爲本刊寫了「蒙古的月牙地」一文，這些都是一些很有內容的文字，問題不在於他徵引了許多古老而有份量的資料，而在於他能提供我們新的認識和新的任務。蒙古和西藏新疆對於我國國防和建設的重要性，已經成爲世界注目、且與我們全體同胞生死攸關的了。著名的探險家及學者斯文赫定曾對我們的外交次長說：「乾隆皇帝在帝國周圍建立的半圓形的屏藩已只剩了一環。共和以來你們已失去了西藏，外蒙和東北四省，而內蒙也受嚴重的威脅。新疆還是中國的。但目前正因爲回軍的變亂和內戰而分裂。如果對這一省沒有作爲，它也是要喪失的。」

赫定的話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底說的，當時正在日本侵略我們東北四省之後的國難期間。赫定是考古學者，但他對於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却是異常精通，我們甚至也可以說他對反共戰略也具有極精湛的見解。有清一代在中葉以前之所以沒有大的變亂，主要的原因實在於能够有效地控制和統治邊疆，這可能有很多因素，譬如中央武力的整備和邊疆制度的確立等都是。可是即使到了中葉以後，海陸兩方均有帝國主義環伺侵略的情形下，仍能有效控制新疆者，主因原因還是由於當時有一位偉大的軍事家和戰略家的左宗棠。左宗棠對蒙古、新疆的戰略關係，瞭如指掌，他的主張也許遭到海疆派的反對，可是新疆的安定，實在爲中國和平建設所必需。滿清雖然積弱，但是即使到了清末，大體上尚能維持一個苟安的局面，其中尤以新疆一省更較能克服困難，直到民國初年

們的抗暴運動是前仆後繼，再接再厲的。雖經中共武裝部隊的血腥鎮壓，及不斷地加緊管制，但由於西藏全境均屬高原，層巒疊嶂，峽峭插天，崑崙山脈盤結於北，岡底斯山脈綿亘於中，喜馬拉雅山脈蜿蜒於南，地勢異常險阻，向有一「世界屋脊」之稱；加上民族性的強悍。因此，藏人爲求生存，不能不跟中共拼命！在一次逮捕的浪潮中，前駐藏中共軍高級幹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相繼，於一九六五年已遭整肅，罪名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藏情勢更爲混亂，據加爾各答「政治家報」報導：藏人現在藏南據有十七個游擊基地，以與共軍抗衡。而在去年十月的一次戰鬪中，由於共軍縱火屠殺，傷亡數字以萬計，看來藏人難逃滅絕的命運！（轉載自香港星島日報）

，軍閥混戰，中原鼎沸，形勢才發生了大的變化。可是即使如此，楊增新却仍能閉關自守的方法而維持了一段較爲安定的時期，直到盛世才主政，勾結俄帝和八路共匪，新匪在外寇和內奸的夾攻之下，才一發而不可收拾。

從趙尺子先生局部地理形勢的研究看，外蒙古是世界的「心臟地帶」，固屬重要，居於月牙地帶的內蒙地區，更屬重要，因爲它能包圍「心臟地帶」而困阻或毀滅之，若就斯文赫定的看法，顯然他所注意的幾何學名詞的「乾隆皇帝在帝國周圍所建立的半圓形的屏藩」，東自東北四省、西南至西藏緬甸，當時業經「剩了一環」，真無異當頭一棒，使人深醒。趙尺子先生在文內業經提到「二十世紀戰略核子時代」月牙地的作用，筆者奢望，尤願意知道太空時代這種戰略關係的演變趨勢，因爲假如說新疆也算得上是亞洲的心臟地區，而毛匪澤東却霸佔了那塊土地做爲核武器的製造與發射基地，它的重要性在對外訛詐上和對內鎮壓上都是無與倫比的。而同時在思想上和地理上都是以蘇俄帝國主義爲背景，（反毛派亦是如此）在長久方面想，這是個更堪注意的問題，反之，如俄毛關係長久惡化下去，則這一「心臟地帶」可能發生之作用，也是極其可觀的。主要地似乎還要看這一地理環境究竟是由誰來使用。古人說立國不以山河爲險，在太空時代新的要求之下，我們當能看到的尺子先生和其他高明的讀者，進一步地研究如果能以像斯文赫定所說的「半圓形的屏藩」爲研究範圍，我想那將是落於形勢後面的觀念。

特 載

接見日本編輯訪問團

蔣總統談話全文

〔中央社訊〕中央社昨日自官方獲得 蔣總統於八日上午，在高雄接見日本新聞界編輯幹部訪華團時發表談話的全文如下：

總統對越戰問題，曾首先確切指出，越南戰爭，並非徒爲越南自身之問題，而乃爲整個東亞的問題，其起源亦不在北越共黨，而實繫於中國大陸共匪。事實十分顯然，今天東亞一切災禍與不安，都是共匪竊據大陸以後之所發生造成。不論過去的韓戰、印戰、今日的越戰，以及印尼等東南亞各國一連串共黨威脅，幾無一日之安定，尤其今日日本、韓國之共產滲透紛擾，無一不出於共匪之操縱指使，即使琉球問題，亦正在醞釀，不久將來，也無法倖免其不相繼發生。要之，共匪竊據大陸一日，則東亞必不能有一日之安定，世界亦絕無一日之和平可言。

總統又指出，最近日本親共份子，揚言日本須與共匪建交，並支持其進入聯合國，同時反對吉田書簡。我不明白，持這些論調的親共份子，是否曾以日本人自己愛國的立場，來作爲衡量日本國家前途的根據。我在前面已經說明，越戰問題，實不過亞洲問題的一部分，今日日本正居於亞洲重要的關鍵地位，日本究將何去何從？日本右邊就是美國，左邊就是共匪，日本如向左而進入於共匪懷抱，則其不獨關係日本安危，實亦關繫亞洲今後之全局局勢。

總統爲他們剖析了共匪的形勢，總統指出，共匪之偽政權，由於其首領劉少奇被批鬥軟禁，實際已淪於無政府狀態；共黨之偽組織，由於其中央的總書記鄧小平，兩年來亦已下落不明，共黨各地的組織，也已完全崩潰瓦解；匪軍內部，在以前的，如彭德懷、黃克誠，姑不必說，其最近的，如羅瑞卿、賀龍、陶鑄、楊成武等一連串之慘遭整肅，更已陷於派系紛歧，衝突互鬪的險境，目前不過是尚未爆發到內戰的表面化而已。

根據此次日本駐亞洲使節會議所報導的，說共匪的「文化大革命，將在今年十月結束」云云。這一說法，是他們想象今後共匪之變化，認爲在其「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繼之以僞第九屆全代會之召開，必可見到分曉。總統認爲，如果共匪成立了所謂全面性的黨的「革命委員會」，召開了僞九全大會，則其大會召開之日，「革命委員會」成立之時，亦即爲其徹底崩潰的開始。我們只要看匪的所謂總的「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三至六個月內，就即可以確定其是否存在，抑是否即將加速崩潰滅亡，但中國人民皆相信匪軍各派的鬭爭，亦必將在那個時候爆發，而其內戰，就必由此表面化。請你們日本朋友，不妨在這個時候靜觀一下再說吧！

總統隨後還強調，共匪在黨、政、軍問題之外，還有着大陸上廣大的人心問題。總統以反問的口氣說，試問今天大陸人民，那一個還相信毛匪？那一個不想推翻中共？人心的解體，實在比黨、政、軍的瓦解，更爲共匪失敗的張本之張本。因爲今日世界政治潮流的趨勢，乃是人人渴望自由與民主，如果還有那一個罪魁禍首，敢於專憑其軍隊暴力——即使其據有核子武器——以

此長期的壓迫人民，控制政權，其失敗之速，將出乎意料之外，此在世界上往例甚多，實不勝枚舉！

此時，總統又再補充地說，日本親共份子，動輒主張承認共匪，主張共匪進入聯合國，並主張廢棄吉田書簡，此種幻覺，事實上決非如此簡單。總統明告他們，吉田書簡與中日和約，有其互相關聯的關係，我和吉田先生當時互相諒解，吉田書簡，實乃爲中日和約之補充文件，蓋此乃當年吉田先生代表日本政府與我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訂立中日和約之後，彼此感覺不足，故有此一書簡之發生，今日如欲廢棄此一吉田書簡，即無異是等於廢棄中日和約。

如果像日本親共份子想像那樣，假定日本政府與共匪從速建交，那末第一個問題，首須與我中華民國絕交，過去吉田政府與我們中華民國所訂的和約，我自必宣佈無效，如是則日本勢須發生與匪重簽第二次和約的問題，在第二次和約中，又勢須發生賠償問題，亦勢須牽涉到日美安保條約的存廢問題，以及琉球歸屬問題，而此猶不過略舉一二而已。其他關於日本內政等等所及的問題，自必相繼發生。當然，在開始，共匪也可能故意什麼問題都不提，但等到一旦中日邦交宣告斷絕以後，它就什麼要脅詭詐都會提了出來。個人不知日本親共份子，是否亦曾對此等後果與危機——即對日本之安全與前途將發生如何影響，有過深刻的考慮推究否？並請問你們有什麼準備？

總統說，他亦常常聽見有人談及日本，既可不偏右向美，亦可不傾左親共，只採中立路線，求得與中共和平共存，就可以苟全自保，綽綽有餘。實在「中立」這個名詞，不過是共匪製造玩弄的虛文而已。所謂「中立」與「共存」，乃屈從共匪，第一步不自覺的淪爲它的共奴的代名詞。如果日本因爲共匪擁有核子武器，所以只好「中立」，以圖自保，此尤爲企圖一日之苟安，而貽國家無窮之禍害的最大失着。大家都知道，今天共匪在世界上，乃以美國蘇聯爲其第一號敵人，而在亞洲則以日本爲其當面的第一號敵人，因爲共匪不但要控制亞洲，而且還要赤化世界，所以共匪最怕的就是你們日本要領導亞洲，以故共匪始終與你們勢不兩立。在這種情況之下，日本縱欲自保，共匪果能聽你們自保麼？實在，日本今天，不但在東亞已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應積極的以其精神的、道義的、舉足輕重的力量，切實負起支援亞洲各國反對匪共的責任，而斷不可自甘於所謂「中立」的、「共存」的、附庸的、自取禍亂的地位，如其傾向共匪，那實無異是對匪共屈從，如此，勢將爲亞洲國家所反對，那還談得上什麼領導亞洲，在你們國家之內，也就談不到什麼民主與自由了。

總統最後又告訴日本記者一行說，我們爲日本着想，以日本今日世界上之地位，無論從外交上、經濟上，皆應以其實力，站在反對亞洲禍源——中共的一方，如其必欲親匪，則只有導致共匪對日本不斷的滲透，擴大其顛覆的勢力，而其禍患，必不旋踵而至。因此，總統一再強調，共匪在大陸存在一天，則亞洲各國，尤其在東亞各國，決沒有一日和平安全之可言。今天唯一途徑，就是由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消滅共匪，光復大陸，否則越戰和談，縱使表面上獲得一時的解決，其解決亦絕不可能徹底，且必將在亞洲各處，很快的再度燃起最大的新的戰火。

總統並寄語日本友人，切盼日本有識之士，皆能有如吉田茂先生那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獨具隻眼，能與總統並與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密切之合作與深厚之友誼，共同攜手，爲亞洲安全、爲世界和平、而努力合作，以消弭亞洲危機，此乃日本唯一的安全與獨立自由之道。

編輯後記

本期出版稍爲愆期，是因為等候幾篇重要稿件的關係，特向讀者致歉！

本期有幾篇重要論文，第一篇是徐東濟先生所寫的「略論憲法中特別邊疆民族條款之意義」，這篇文章的論點非常正確，如果不是作者用生花之筆把它婉轉透徹地寫出來，也許在許多人的心目中，祇存有一個模糊的印象，難怪蒙族先進李永新先生深譴其說了。

在本文裏有幾段引用的名言值得在此特加介紹：(一)是國父孫先生的「除血統、生活、語言、宗教與風俗習慣之外，最重要者爲共同之民族意識」之遺教，他說：「民族主義之範圍，有以語言、文字爲歸者，有以歷史、習尚爲歸者，莫乎遠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義範圍，則以意志爲歸者也」。法國學者雷南則說「一個民族必須包含悠久的共同的過去歷史，而對於現在，則其精華薈萃乃在顯明的同意與企求，要繼續一個共同生活。」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也正是像他所說，「曾經一同忍受，一同歡欣，一同希望」而且也有一個「共同努力企求實現的計劃。」

六月初徵信新聞刊載一條新疆某族在俄境成立了所謂反毛獨立「政府」的消息，這當然不是真正出諸中國民意的，真正的中華民族反共是必然的，但不會在俄境成立什麼「政府」。俄帝和毛匪爲了顛覆中國政府，爲目的而不擇手段，三十六七年在伊犁也製造過類似的偽組織，現在輪到老毛子整毛匪了，其實他們都是一丘之貉，我們看看這篇文章，便可了解我們憲法中特別邊疆民族條款的意義之深長了。許占魁先生的「邊政漫談」是一篇有份量有內容的文章，它把治邊的道理說得很透徹，相信無論在朝在野的人士，都值得細加品味咀嚼！「西藏名稱與境域之沿革」一文考證繁詳，頗有參考價值。甘肅走廊和「河曲藏區行腳」兩文，不但內容充實，而且文筆生動，前者把走廊的價值，後者把河曲藏區的風情描繪如畫，是兩篇極好的文字。

戰後日本的對華政策是極爲短視的，不時有與共匪勾結的企圖，總統這篇接見日本編輯訪問團的談話，義正辭嚴，明朗透闢，與「敵乎？友乎？」同樣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二十二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永新

社長：周昆田

主編：宋念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五二八號四樓
電話：二四二〇二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五四五九二四・五四五九二八

CHUNG KUO PIEN CHENG

(Studies in Chinese Frontier Affairs)

QUARTERLY

No. 22. June 1968

CONTENTS

On the Meaning of the Inclusion of Special Articles o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Hsu Tung-chi
Table Talks on Frontier Affairs (I)	Hsu Chan-kuei
The Mongolian Crescent.....	Chao Chih-tzu
The Kansu Corridor.....	Yu I
Han Management of Turkestan and Turkestani Culture	Sung Nien-tzu
A Traveller in the Tibetan Settlements i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Chang Tzu-tung
Treasury of Ancient Mongolian Culture.....	Uniuanta
A History of the Name and Territory of Tibet	Sung Lung-chuan
Peiping's Crimes in Attempting Extinction of the Tibetan Race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Huang Chin-wen
The Full Text of President Chiang's Talk to the Japanese Press Mission	

PUBLISHED BY THE CHUNG KUO PIEN CHENG ASSOCIATION

4th Floor, 1528 Chung Che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